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市政府



县(市、区)政府



乡、镇(街办)



铁路



高速公路及道号



国道及道号



省道



县道



省界



设区市界



县(市、区)界



2013 · 11, 6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于 芹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选录一） 04

【峥嵘岁月】

挺进山东 王秉璋 10
难忘白彦
——追念与蒲文学同志抗战期间的战友情 张其贤 16
回忆“抗日小学” 靖玉树 21

【名人素描】

抗日儒将安征夫 安 石 24
回忆父亲宋日昌 宋 崇 27

【文化掇英】

王献之被公主抢亲后的悲惨人生 紫衣飘飘 31

【蒙山沂水】

“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水库 魏贤胜 34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7
“金鸡”传奇 寇玉坤 43

【探索发现】

临沂钩沉之孔门诸子 高 雷 46

【文史论坛】

“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考 虚静斋主人 53

【影像沂蒙】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略影——

沂蒙“红嫂”之二

本 编 56

【诗画赏析】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四

李兴河 58

【史料辑存】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一） 62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赵姓（下）

赵丹峰 64

【沂蒙名医】

忠肝义胆仁者心

——好个曹玉军

刘凤才 71

【沂蒙乡亲】

薛其坤：走向不惑，走向成功

高雪萍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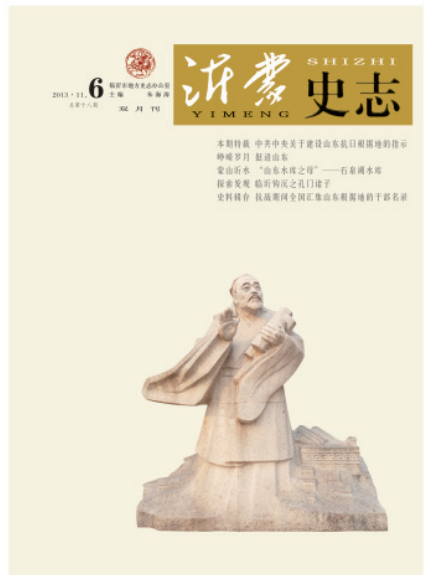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临沂人民广场雕塑·文韬武略之曾参

（封面人物介绍见本期《临沂钩沉之孔门诸子》）

封底：书法/胡石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 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关于建设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选录一）

编者按：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省委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与第一一五师主力共同创建的，而沂蒙山区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抗战八年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山东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战略指导和指示，从现在能查阅到的资料看，仅电报就多达上百件，八路军总部（集总）、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北方局关于山东的电报有600多件。本刊将分三期刊载部分电报内容，以飨读者。本期刊载的是中共中央及北方局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电报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战争全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一再指出要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八路军在敌后的重要战略基地。1938年5月，派郭洪涛率领的50多名干部来山东工作，郭洪涛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和刘少奇为此作出了特别指示：“要建立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据点。”随后，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边区省委书记。

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需要有一支在政治和军事素质上过硬的抗日部队。中共中央及时派八路军主力一部来山东。1938年5月19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指出：“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作基干更好。”在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派兵去山东。”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就山东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创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作出指示。12月6日，在《对山东的军事工作的意见》电文中指出，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以求迅速地正规化。1940年1月28日，指示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现在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是山东与华中。第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

从1939年初开始，中共中央、毛泽东相继作出了在山东各地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和党的工作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山东省委：

济南失守后，日寇继续南下，津浦线济南、徐州间有完全被日寇占领之可能。因此，山东广大地区有沦为被日寇占领区域之危险。

目前省委工作的布置，应注意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占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省委的工作，应着重下列几点：

(甲) 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根据最近中央新的决定，重新布置工作与重新教育干部，成为顺利的进行游击战争与创立游击区域的基本条件。从省委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已经看到你们已注意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之好的。对于发动游击战争，我们还有下列的提议：(一) 创立在党领导下可靠的基干游击队。必须动员好的干部党员到这种游击队内去。(二) 游击战争必须密切与群众联系，才能生存和发展。

(三) 游击战争必须正确的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能达到抗日的整个任务。(四) 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的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的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土匪为日寇所利用时，我们也不应当去积极反对他们，而应当使他们中立，即是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而又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五) 对于当地旧政府和专员、县长等，当他仍旧在该地继续抗日，应当与他们合作，共同行动；当旧政权退出的区域，抗敌后援会可起政权的作用，但不必组织其他名义的政权。(六) 估计山东地区广大，日寇



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派兵去山东”。图为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来。

虽然暂时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无法占领一切地区。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内，坚持在山东的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七）同时估计到山东大部是平原，交通比较便利，因此，当游击队受到敌人的压迫时，应当非常机动的采取有进有退、流动游击的办法，不使游击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当大的游击队（如连以上）不能在某个区域活动时，他应当按照情况向新的地区转移和发展，应当留下小的游击队（如班排）继续坚持斗争。（八）最重要的，应当估计山东游击战争是比较长期性的，因此，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因此在党的工作上、群众工作上、游击战争上都必须采取积蓄力量，保存力量的方针，即是“赚钱就来，失本不干”。

（乙）党的工作应当适应山东被占领的环境和游击战争的任务来布置工作。因此：

（一）把党的组织和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当地不能立足以及准备动员到游击队内去工作的干部和党员，应当参加到游击队内去；另一部分是准备在日寇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区域内，坚持党与群众的工作，须严格的保持秘密条件下党的工作原则，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进行工作。（二）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因此，我们提议省委应在鲁中区较为适宜，万一在徐州被占的情况下，省委应以苏鲁边广大地区为活动范围。

（三）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应当大量的吸收积极的工农成分和革命的学生入党，但同时必须严密党的组织，不使一个奸细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四）对于出狱和恢复关系的党员，应重新考查。（五）应当设与各个区域建立经常的秘密交通关系。

在山东被占后，省委的工作将进<到>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应当抱定在山东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即使在与中央的关系断绝后，也应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独立的进行工作。依靠中国正规军队收复山东不是短期的事。因此省委应当在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的原则下，发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坚持在山东与日寇作斗争。

中共中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

关于山东工作方针，我们意见如下，望讨论电复：

（1）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我各支队活动区域问题上，应尽力争取有利地区，决不放弃已得地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及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

（2）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荫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别慎重，否则会自己搬石头打自己脚，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

（3）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在政治上占上风，以我们光明正大主张压倒与批驳顽固分子的无理的错误的议论与行为，关于他们对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污蔑，应公开在舆论界及群众中与之斗争，我们不应采取请求的低头下气的方式，如请于沈^[注]转呈蒋将山东纵队留原地区作战之举显不妥当，而应主张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

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主张调走者实属危害抗战利益违背保卫地方之原则，而于沈两部却可酌量抽调赴北宁路。总之，对付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

(4) 在山东除努力巩固与发展山东纵队外应努力发展地方党，据我们已得材料，山东党员数量仍小。

此外山东分局应严重注意团结党的干部及提拔山东本地干部和群众领袖到各级领导机关中来，这对今后斗争有极重大意义。

中央书记处

十九

[注]：指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政府主席沈鸿烈。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

分局诸同志并报中央：

我们完全同意12月9日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指示。听了郭、张同志^[注]报告，有以下补充意见：

甲、山东是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基点之一，是开展华中、与新四军打成一片的枢纽，是八路军兵力、枪支、经济补充与开展的重要地区，必须抓紧目前敌军旧军及顽固分子新的力量尚未增加的有利时机，大胆的放手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创造我们的伟大力量，使游击区迅速成为自己的根据地，准备在更严重的情况之下，独立坚持山东的游击战争，向苏北、皖北、豫东开展，巩固鲁西北，与冀南联接。

乙、作战方面



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彭德怀（左二）、朱德（左三）、邓小平（右一）



A.正确掌握统一战线方针，努力争取一切中间阶层与进步分子。对于顽固分子反共反八路军之行动，必须给以严重打击。凡遇军事进攻，应准备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给以反击。继续开展反妥协、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巩固已得的优势，努力削弱与消灭顽固分子的武装力量。

B.确实掌握泰山、鲁山、莲花山及沂蒙山，孤立沈鸿烈，麻痹张里元，消灭秦启荣，发动民众武装及扩大我军，协助第一一五师，应确实掌握抱犊崮岭区，有准备的消灭刘桂堂。胶东应争取张、姜两部，麻痹赵保原，打击蔡晋康，发动莱、栖霞、蓬等民众的武装起义，配合各支队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蔡部，掌握牙山区，开展胶东的局面。

C.麻痹地主阶级，利用其矛盾，对于最坏的应坚决打击之。

D.加强鲁南总动委会工作，依靠这个中间力量，开展山东进步力量的组织工作。

E.将朱、彭所公布的七大纲领广为宣传，成为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纲领。

丙、政权方面

A.我们领导的政权，必须认真实施善政与进步法令，切实改善民生，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运动，改选各级政府。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民众拥护，才能不被日寇与顽固分子所摧毁。

B.应明确认识我们领导下的政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除外的。因此，鲁西北地区政权机关中，已经混进来这些分子，时刻当慎重分别洗刷，加以改造。为了加强政权工作的领导，在部队和地方干部中，物色宜于其能胜任政府工作的同志，调出分配政府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C.不放松一切可能机会，根据中央所提办法，努力争取政权。胶东在反蔡武装斗争中，必须取得和改革政权。

D.为加强已经取得政权之领导，并提高其作用，以后凡有三县政权的，即成立专署（如胶东），有两个专署的地区，即成立主任公署。沂、蒙两县应利用机会成立县政权。

丁、军事方面

A.山纵开始由游击队向正规军前进，必须努力整训工作，积极在战斗中训练，使之正规化。

B.山纵将成为坚持苏鲁抗战的主力军，力求大量扩大，发展成为三个旅一个团的一支正规军。

C.抽调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协同地方党整理现有的游击队，使之更带有组织性，以发挥其作用。必须在军队掩护下，协同地方党广泛组织游击队，使游击队真正胜任保卫地方任务，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求得最大的机动性。

D.真正建立军区工作。军区应成为党政军民的共同军事部门。各级军事部门，保证在该党部的领导下，加强对地方武装的建立、整训及指挥。

E.有计划的抽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开展伪军工作，争取伪军反正，争取及改造地主会门武装。

戊、财政经济政策方面

A.分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军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实行开展节约办法。分局财委会不仅为设计机关，而且为财政经济的最高执行机关。

B.北海银行在胶东、清河发行纸币，还可适当增加。鲁南、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纠正不统一的各自为政的办法，例如各发流通券（鱼台、单县、路[湖]西）。在群众中提高这些纸币的信用。坚持反对顽固分子破坏纸币行为，大量以我们的纸币收买现金，发展生产合作企业。胶东尤其注意此项工作。

C.公布其政权机关的财政工作，实行累进税制，建立对外贸易，征粮收税，屯积公粮，求得解决县政的长远计划。

D.应切实行节省运动。按照预算开支，反对破坏节省制度，惩办贪污浪费分子。军队中由各级首长及政治机关保证供给的建立。

E.提高生产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小手工业，健全合作事业。

己、群众运动方面

A.深入群众工作，是山东党最大的任务。纠正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斗争、在军队没有足够的帮助群众工作的缺点。

B.研究会门工作经验。经过艰苦工作去瓦解会门，建立这些团体中的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教育，使迷信团体变成游击队自卫团，成为进步的抗日力量。

C.瓦解地主力量是必要的，特别是必须争取反动影响下的群众及其武装参加抗日团体，变成进步的抗日力量，必须克服经过地主组织群众武装的现象。

D.应以工农等基本组织形式来组织群众，并积极推动民主民生斗争，来充实与扩大这些组织，使这基本组织能够逐渐代替那些迷信的落后的组织。

庚、党的工作方面

A.山东应当严格注意党组织和秘密，建立社会部和加强组织部。分局与区委应当经常的在工作中去审查各级干部。不要因为过去审查过的，对这一工作忽视。

B.山东党应当在反顽固的斗争中，去开展落后地区，发展党员，要将巩固工作当作主要的任务，求得巩固的发展，调整党的成分，洗刷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占有多数量的（如沂蒙），必须加以改选，使各级党部掌握在忠实可靠、经过考验的干部手中。

C.加强党内教育、阶级教育，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克服自由思想和封建的保守观念，锻炼原则的意见一致。

D.教育锄奸干部与党的组织部门密切联络，反对锄奸干部脱离党的领导，抓住超组织的特务工作，深入的研究苏鲁区这一严重的教育[训]。

E.派得力干部或巡视团到苏鲁区，整理苏鲁区党的工作。

F.地委及县区各界应尽可能缩小，便于深入工作。

辛、宣传教育工作

A.扩大军政学校、党校。根据山东干部占绝对多数的情形，各级学校应特别注意数量的增多，不应过早偏重质量。分局及区委党校应力求扩大，保证所有干部定期能受一次训练，对工人党员尤须大量接收。

B.纠正在职干部忽视学习的现象，实行每日读书两小时的制度。所有党员必须定期训练，加强自己思想上的准备。

C.《大众日报》应有明确规定为分局机关报，提高党威信。李竹如等三同志是《新华日报》派去适宜于办报纸的干部，可专门办报纸，地委以上都是地方性质的报纸，应公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D.整理现有印刷厂，大量翻印马列主义书籍，广泛散播马列主义。

北方局

[注]：即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

挺进山东

王秉璋

1938年春夏，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其后，第一一五师主力（师部与第三四三旅）开始陆续东进。1938年6月，曾国华率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向冀鲁边挺进。9月下旬，萧华（时任第三四三旅政委）率该旅旅部100多名干部向冀鲁边挺进。12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向（微山）湖西挺进。12月下旬，师部和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开始东进。补充团留在晋西，与地方游击部队合编为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由第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任支队长。我们离开晋西的时候，朔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1939年元旦，我们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我随陈光、罗荣桓一同去总部向朱、彭首长汇报工作。当时，第十八集团军名义受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节制。山东最初属第五战区。1939年1月，国民党成立了苏鲁战区，由东北军的于学忠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各部。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同意一一五师主力到山东去的，因此，我们对外不用一一五师的番号，而使用“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名义。恰于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冀南袭击八路军，并强行取消我抗日民主政权。彭德怀要前往冀南处理此事，我们就以护送彭德怀的名义东进。东进途中彭总给师部打了个招呼就直接下到基层作调查，连续三天，他把所有的连队都摸了一遍，与连长、指导员都谈了话，最后才到司令部问我有关部队训练方面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交谈。他首先问我：“你对全师的连长、指导员都了解吗？”我说：“三四三旅连以上干部都是红一军团的，我比较熟。三四四旅的干部以前是红十五军团的，过去没接触过，到山西后，他们很少与师部一起行动，接触少，尤其是基层干部接触更少，一般不大了解。”自平型关大捷之后，第三四四旅就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随后彭总询问我如何组织部队进行射击、投弹和战术训练，我一作了回答。他的工作作风可谓细致入微，有一次，部队正在行军，他发现有一名战士背的枪很特别，问我：“那是什么枪？我怎么没见过？”我告诉他那是不久前缴获的日本制造的马步枪。他将那位战士叫来，拿着枪看了很久，他见那种枪不是通过准星和缺口瞄准，在枪管上有一个圆环，于是问我：“这种枪的标尺怎么用？”这一下



王秉璋（1914—2005），河南省安阳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

解放后，王秉璋先后任空军参谋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领导在鲁南。前排左起：萧华、陈光、邝任农；
后排左起：杨勇、朱瑞、王秉璋。

把我问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种枪标尺怎么定。不过，我们的战术原则是近战，敌人走近了才开枪，不必修正定偏，只要将目标圈在圆环里就行了。”在太行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师长看到我们有上百匹驮着军用物资的骡马，说：“你们这么浩浩荡荡怎么得了哟！到了平原，遇到敌人怎么办？”陈光听了刘师长的意见，决定将大部分弹药分发给战士，减少了部分辎重。刘师长说山纵是新部队，政治上很好，但是新部队军事上没有经验，并特别嘱咐说：“你们要注意山纵的部队发来的电报，那些部队的参谋人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会使用军语。”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山纵某部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军与顽军各上千人在某村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冲锋十几次，双方无伤亡”，既然在一个弹丸之地的村子里发生冲锋十几次激战，怎么可能无伤亡？刘师长指出：“说明草拟电报的同志根本不懂什么叫‘激战’，什么叫‘冲锋’。因此，对他们提供的情况，你们要注意分析。”我们下了太行山，越过平汉路，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跨过黄河。那时黄河没有水，1938年6月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进攻武汉，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导致下游改道，使这段黄河干涸了。1939年3月1日东进支队从鄆城进入鲁西，正式踏上了山东的大地。

陆房战斗

1939年3月4日，杨勇率第六八六团进攻鄆城县樊坝的伪军刘玉胜团。当日夜杨勇率部冒雨疾进，连夜发起攻击，于次日全歼驻扎在樊坝的伪军600余人，生擒刘玉胜。其后陈、罗决定将第六八六团的第三营、教导队和师直两个连留下，新组建一个团（当时称东进支队第一团，后改为独立旅），由杨勇任团长。此前，杨勇任第六八六团长兼政委，杨勇留在鄆城后，由张仁初、刘西元分别接任六八六团团长和政委。

3月中旬，师部和第六八六团（欠第三营）在东平县与中共泰西地委（地委书记段君毅）和山纵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委张北华）会合。师部先驻夏谢，后驻常庄。不久，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也来到这里与我们会合。为了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抗

日斗争，中共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张霖之、赵博（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朱则民（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七名委员组成，罗荣桓为书记。我们在这个地方立下脚来，开始仿效在山西的做法，准备建立和扩大由我党独立领导下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最初，军事斗争主要以打伪军为主，消灭了伪军，就打掉了日军的耳目，使他们孤立据点内，成为聋子和瞎子。陈、罗指挥师直和六八六团，在山纵第六支队的配合下，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扫除了汶河上伪军的所有据点，歼伪军大约一二千人。我们行动对日军震动很大，日军最初并不知道我军的实力，向我们连续进行了三次进攻。第一次敌人出动600多人，进至鲁西区党委驻地附近，那个地方离师部驻地常庄大约六七里路，我们接到张霖之的告急电之后，即派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去掩护区党委转移。这两个连和区党委的警卫分队一起将敌人击退了。第二次日伪军出动上千人，进至六支队第二团驻地附近，这个团是新部队，战斗力不强，但团长是个老红军，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我记得他当时已经结了婚，他的夫人穿着军装，跟男战士一样剃个光头。陈光为了锻炼这个团，令其在正面防御，敌人进攻的时候不准撤退，同时令第六八六团和师特务营各抽两个连保护该团两翼。地方部队打惯了游击，一般不打硬仗，可是不打硬仗，战斗力就很难提高。当时主力部队少，为了迅速使六支队上升为主力，陈光很注意帮助他们搞过军事训练。这次战斗以该团为主，将敌人打退了。经此一战，该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以后遇到敌人的进攻，他们也能主动打正规战了。第三次敌人出动2000多人，在东平、汶上一带进攻六八六团，又被我们打退了。这三次进攻均以日军为主，伪军较少。这三次进攻均被打退后，日军才确信老百姓所说的“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并非虚言，于是就来了个九路围攻，这就发生了陆房战斗。陆房战斗是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初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至今争议颇大。1939年5月9日，我们在常庄得知日军在东平、东阿等处增兵，当时判断敌人要向我们发起进攻。当时，罗荣桓到东汶宁支队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去了。当日夜，师部越山向东转移，走了二三十里到山的东面的一个村子，又发现日军在泰安也在增兵，东、西两个方向敌人都在增兵，判断日军可能想东西夹击我军。10日夜师部转移到王庄，师部在这里开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准备到汶河两岸活动。为了解汶河两岸的情况，将段君毅请来列席会议。段君毅建议向西南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会上决定师部向西南转移。会后，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准备行动，此时汶河南岸也发现敌情。陈光考虑到师部有上百匹骡马的辎重队，目标太大，汶河南岸是平原水网地带，不便于活动，于是决定向北面的大峰山区转移。当时考虑到北面也可能会与敌人发生战斗，决定第六八六团扼守肥猪山制高点。向北行动时，我带特务营走在师部的前面，11日拂晓，走到凤凰山与黄土岭之间的山口，正好与敌人遭遇，我立即向陈光报告。陈光令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抢占凤凰山，第六八六团据守肥猪山和岈山，师部特务营抢占凤凰山与肥猪山之间的山岭。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几处阵地战斗同时打响。陈光派骑兵连向东侦察，不久，骑兵连在东面也与敌人遭遇。这样我们意识到已经处于敌人的包围圈中，情况异常严峻，陈光决定死守各阵地，待夜间再突围。上午10时左右，陈光离开师部到六八六团督战，我留在师部指挥。那一带地形是以陆房村为中心的纵横仅六七公里的小盆地，周围山岭均不高，制高点肥猪山海拔570米，只要一处让敌人突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包围圈中的部队有师直属队、第六八六团（欠第三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七团、山纵第六支队一部，除此之外，还有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地方党政机关的大量非战斗人员。第一一五师师部还从来没有处此危险境地，我深感责任重大，怕负不起指挥之责，令通信科将电话线通到六八六团团部，以便陈师长亲自指挥全局。可是电话线接通后，陈光不在团部，他直接下到营里指挥作战去了。这样我不得不负起全盘指挥之责。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我在师部指挥了近6个小时。这期间发生了两次师部直接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上午11点左右，有一股七八十人的日军，从津浦

支队和师部特务营的阵地接合部突了进来，进到距师部只有五六百米的地方，当时师部附近有大量没有武装的非战斗人员，我派李作鹏（侦察科长）带警卫连的两个排迎击该敌。这股敌人一打就退回去了。12时左右，又突进来一股二三十人的日军，这次我派一个排去迎击敌人，这次是李作鹏率领的还是周乐亭率领的记不清了。敌人也是一打就退回去了。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似乎不像是日军的战斗风格。日军一般是比较顽强的，不经过激烈战斗不可能轻易撤退。事后才想到，除肥猪山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战斗异常激烈之外，其他均为日军的堵截方面，只要将我军堵住就行，所以进到师部附近的两股日军是来进行侦察活动的，发现我军仍在他们的包围圈里就放心了。下午3时左右，接到罗荣桓政委从东汶宁支队发来的电报，他说那个方向没有敌情，建议我们向他所在的方位突围。4点多钟，陈光回到师部，派人到政治部把黄励叫来，我们三人开始商量夜间突围方案。我把罗政委的电报拿出来，陈光决定照电报中的建议突围。制定突围的具体计划之后，陈光派黄励到津浦支队去组织该支队的突围。当日深夜，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第二天拂晓，敌军向肥猪山等地猛烈炮击，随后发起攻击，却扑了个空。这次战斗，敌军参战兵力大约在5000人以上，具体数目不清楚，有说8000的，有说1万的，也有说5000的，其中大部为日军，伪军很少。据说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令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不过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的史料证实此事。至于我军被围人数也有不同说法，有说3000的，有说5000的，有说8000的。我估计在六七千人左右，当时师部及直属队大约1000，第六八六团将近2000，津浦支队1000多，冀鲁边第七团1000，还有第六支队一部及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人员。另外还有国民党肥城县长率领的田家滨旅几百人也在包围圈里。我军伤亡人数战后统计为360人。至于敌军的伤亡人数，说法不一，当时根据各部队的战斗报告统计为1300人。陆房战斗之后，山东伪军出的报纸宣称以伤亡1200人的代价，消灭八路军1万多人。这也证实，我们当时统计的歼敌数目大致上是准确的。不过，现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说歼敌数目夸大了，根据参与焚烧日军尸体的老百姓回忆，大约二三百具。我要强调一点，作战伤亡的比例通常是3:1，即亡1人，伤3人，在无法准确统计时，通常按此规律推算。如果焚尸二三百具，那么歼敌数目也基本与我们当时统计的差不多。还有的夸大了歼敌数目，说敌军遗尸上千具，那么歼敌数目就达四五千人，这显然太夸张了。这次战斗日军没有动用飞机和坦克参战。还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人说在部队突围之前，陈光、王秉璋就跑到包围圈之外去了，包围圈里剩下的最高领导人是黄励，这显然违背历史事实，目前亲历战斗的人仍不少人健在。还有的人说罗荣桓事先就料到了敌人即将举行大举围攻，并在临行前授陈光锦囊妙计上、中、下三条，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依罗师的责任心，明知敌人有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抛下部队不管而能放心去东汶宁支队呢？对陆房战斗的战略战术也有褒有贬，众说纷纭，在陈光未平反之前，对此战的评价也有欠公正的地方。我对此战的评价是：这是一次胜利的、同时也是被动的和风险很大的一次战斗。

转战鲁南

陆房突围之后，师部在无盐村与罗荣桓相遇，在这里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罗政委在总结大会上认为这是一个胜仗。我们在突围的时候，翻山越岭不得不丢掉了辎重队的骡马挑子，损失了不少“家当”，其中有部分东西是从江西苏区经万里长征带出来的，是“传家宝”，这次也丢掉了，因此部队有人发了些牢骚，有埋怨情绪。还有的人认为如果按原定计划向汶河南岸转移，有可能像六支队主力那样避开敌人的合击。此时我们发现从外地调到附近城镇的日军并未撤回，判断敌人仍然有再次围攻我们的可能，于是决定分散行动，令津浦支队向铁路以东转移。不久，陈、罗决定由我和黄励率师部机关大部过津浦

线，统一指挥第一一五师在路东的部队，预定5月20日出发。临行前，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对我说：“你先结了婚再走吧！”在罗政委夫妇的促成下，我与才认识三个月的史导同志于5月19日举行了婚礼。次日即率部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出发了。我们走后，师部只剩下一个精干的指挥机关，加上警卫部队只有二三百人。到路东不久，我接到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的一份电报，徐、朱任命我为东进支队司令员，后来又接到朱瑞的亲笔信。八路军第一纵队是5月初组建的，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和冀鲁边的八路军部队，第一一五师和山纵受其领导。徐、朱越过师部直接任命我为东进支队司令员，这件事我感到很蹊跷，于是将此电及信的内容电告师部和集总，结果，师部和集总都没有回电，在以后的电报中，师部和集总也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于5月底进抵蒙山西北部的马家峪，在马家峪一带主要从事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

6月初，日伪军出动1万多人向沂蒙山区扫荡，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山纵指挥机关。我和黄励率部朝敌侧后转进，顺利避开了敌人，未受损失。当时，我部大部为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只有两个战斗连队，是没有力量与敌人打硬仗的，如果出现像陆房战斗那样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敌人的这次扫荡大概搞了一个多月。我得知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处境不好，联想到陆房战斗中罗荣桓从东汶宁支队发去的那封电报所起的作用，于是致电徐向前、朱瑞，告诉他们我这里没有敌情，建议他们向蒙山西北部转移。不久，徐、朱就率第一纵队机关、山东分局、省委党校和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等部过来了。当时，我的妻子史导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也随徐、朱来了。她告诉我这次她们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搞得很狼狈，她除了一床毛毯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跑丢了。这床毛毯是结婚时我送给她的惟一的礼物，她舍不得丢，才保住了。反“扫荡”结束后，鲁南地委奉山东分局之命派靳怀刚到马家峪向我们介绍情况。8月下旬我们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到达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我们开始与地委一起发动群众，准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到10月下旬，陈光、罗荣桓也到了大炉与我们会合了。至此，第一一五师师部全部抵达鲁南。

郯码战斗

11月上旬，临（沂）郯（城）邳（县）工委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要求第一一五师派部队去增援他们。工委的活动区域最初在沂河两岸，后被压迫到沂河以西，主要活动地点在郯城的码头镇，那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兴盛的镇子，比县城还要繁华。那一带是苏鲁边界最富庶的地方，是一个小平原。当时工委有一个200多人的独立营，战斗力比较弱。顽军有一个团，1500人左右，七八百条枪，其骨干是台儿庄战役中与主力失散的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和老兵，有一定的战斗力。顽固派头子叫阎丽天，是郯城县长。工委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农民减租减息，为工人增加工资，这些工作受到阎丽天的阻挠，无法开展。独立营也经常受到顽军的进攻。陈、罗刚到鲁南不久，决定派我率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往郯码。临行前，陈、罗交给我一项任务，设法筹集一笔款项。那时候冬天到了，师直属队和第六八六团没有解决冬装，陈、罗为此很着急。自从1938年初周昆从阎锡山那里领了最后一笔经费，第一一五师再也没有得到过经费，那3万块钱早就用光了。我们到达山东后，曾向山东分局要求给我们3万块钱，分局也有困难，没有给我们。我们仍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东南方向挺进，大约于11月中旬抵达码头镇附近，与工委会合。工委书记叫许言，我听了他的情况介绍之后，建议先礼后兵，先做统战工作。工委的同志认为没有用，说阎丽天是国民党内最顽固最反动的蓝衣社分子。我坚持先做工作，不能一来就打他，何况我只带来两个连，加上电台和参谋人员一共才300多人，得寻找有利战机才能下手。我以调停工委与阎丽天的矛盾的名义，给阎去了两次信，要求他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阎丽天没有回信，根本不把我这两个连放在眼里。当时我们驻

在王庄，工委的独立营进至离沂河五六里路的前哨村。11月18日，独立营在南哨活动，阎丽天驻在码头镇内的一个营出来向南哨进攻。我派一个排带两挺机枪前往南哨。顽军进攻南哨，独立营按我事先交待的战法，先放他们进村，顽军十分骄狂，以为独立营不敢打他们，待敌人全部进入村子，我们突然发起反击，一下子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连忙掉头向码头镇溃逃。当日夜，我带两个连在地方党组织的引导下悄悄越过结着薄冰的沂河，摸进镇子。敌人的那个营住在一个圩子里，我们包围那个圩子后，架上机枪，搭好梯子，敌人仍然没有察觉。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攻进去，敌人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反抗，营长以下400多人全部当了俘虏。我军无一伤亡。阎丽天驻在归昌，离码头镇50里路。他不知道在码头镇的那个营已经被我们消灭了，第二天派来一个营增援。地方党组织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我，我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占领码头镇，消灭了他们的那个营，会不战而逃，于是带部队前出到距码头镇五六里路的地方去截击。又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个营被消灭了一半，其余的逃回去了。这次战斗我们只伤亡了二三个人。两次战斗消灭敌人600多人，缴获机枪13挺。从此，阎丽天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与我们作对了。我们秉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没有乘胜进攻阎部，此后形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对我们战斗力如此之强，当地老百姓说：“老八路真是神兵天降！”随后，我们在码头镇筹集了十几万元钱，利用当地的工商业赶制了三四千套棉衣。工委的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减了租减了息。这期间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当时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抗日演剧第六大队从苏北来了，他们主要是由我党的人组织的，剧团经费困难，连饭都没有吃的，要求我们支援。我同意给他们半年的经费，大约五六千元。另外给了工委一些钱，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可能是一万多元。12月上旬梁兴初支队来了，我就率部返回了大炉。临行前接到集总朱、彭的电报，说国民党国防部指责王秉璋部打郯城阎丽天部，并说阎部伤亡不小，朱、彭询问是怎么回事。我回电将事情经过向朱、彭作了汇报。桃峪会议前后师部到鲁南后，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消灭了不少土匪和地主武装，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39年4月，日军出动4000多人以抱犊崮山区为目标进行“春季扫荡”。这次反“扫荡”斗争进行了一个多月，其后，我们开始向北面的天宝山区发展。7月，师部北移至天宝山区的桃峪村。

9月中旬到10月上旬，第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为期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萧华、杨勇和我分别作冀鲁边、鲁西和鲁南工作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一一五师扩编为六个教导旅。大约在1940年初，毛主席曾发来一份密级最高的电报，我记得有这么几句：“陈、罗亲译，不下达，不外传，阅后焚烧。”陈、罗在焚烧前将这份电报让我看过，毛主席指示一一五师必须在山东迅速发展，然后主要经营苏北，再转至大别山区，第一批去苏北由彭明治、吴法宪率领不少于12000人，第二批由黄克诚率领不少于15000人，第三批由师部率领不少于30000人。第一一五师要迅速扩兵，当时把鲁南地委书记宋子成急病了。这个事情也使我们与地方部队关系协调不够好。我在会上提出不再当参谋处长了，要求到战斗部队去锻炼，我从1932年开始搞参谋工作，已经干了整整八年，从未到战斗部队工作过。杨勇（教导第三旅旅长）建议我到教三旅工作。陈、罗答应了我的要求，报经集总批准，任命我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副旅长（第三四三旅），同时任命陈士渠为第一一五师参谋长。

1940年底我正式离开工作了3年多的第一一五师师部，告别了陈、罗和司令部的战友。由此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参谋工作，开始走上战斗部队指挥员的岗位。

难忘白彦

——追念与蒲文学同志抗战期间的战友情

张其贤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鲁南敌后战场上，我和蒲松龄的后代蒲文学同志一同经历了一次艰难危险的考验，让我终身难忘。

1942年，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最艰苦困难的一年，对我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来说，也是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土匪武装殊死搏斗的一年。那年年底的一天，在鲁南战区邮局我见到并认识了蒲文学同志。他当时在白彦镇南十多里路一个山村里（今白彦南涧村一带）任白彦交通站站长。他中等身材，大我十多岁，体态较瘦，走路一拐一拐的，是一年前在八路军某部一次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负的伤。他只上过小学，对同志热情，却不善言谈。这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

我记得那是1943年元旦刚过，日寇又在我根据地周围据点大量集结兵力。从情报中得知，日寇妄图用“分进合击”、“铁桶包围”和“分割封锁”等手段摧毁我鲁南根据地，消灭我军。为了粉碎日寇这次的大“扫荡”，在鲁南区邮局随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转移到外围前，为了坚持《鲁南时报》战时出报并及时发往各地，让我留在了费滕边局。报社印刷厂隐蔽在附近一个山洞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停止印报，我的任务就是就近将报纸发往各地。

果然，二月初，春节刚过三天，日伪军突然在夜间行动，分多路向我中心区白彦镇扑来，结果扑了空。此后日伪军就各处安据点、修碉堡，四处“清剿”，实行“三光”，我们则与日寇周旋。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与地方武装、民兵配合展开“麻雀战”，伺机打击敌人。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们曾经被敌人包围过三次，依靠群众帮助和利用熟悉的地形冲出了日寇的包围圈。恰在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派了九十二军在李仙洲指挥下进入山东敌后，三月初，其一四二师越过津浦线进入我鲁南滕峰边区的根据地，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一进入我根据地就对老百姓疯狂地抢劫、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党我军为维护抗战大局一让再让，顽军则步步紧逼，已距我们坚持的地区不远，我们则处于日、顽夹击状态，中间仅余十至三十里路的活动空间，况且敌人随时都可以出没。在此危急时刻，区邮局王丹墀局长令我到中心交运站（即白彦站）隐蔽坚持分发报纸工作，只要印刷厂还印报就不要离开，敌人

来了就和印刷厂的同志一起依靠群众打游击，一切行动听站长蒲文学同志的安排。

我就背上背包，挎上办公包，带上区局发的一支叫“撸子”的手枪和一枚手榴弹上路了。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山沟里叫南洞的小村子找到了蒲文学。他招呼我和他一同住在村南边一条河沟旁的老乡家里。三间草房，地上铺着一层麦秸、野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床”，老乡吃饭、切菜用的一个小矮桌作为办公桌。三名交通员已派出。老蒲说：“他们回来要到明天凌晨，遇上敌情就不一定了。”他向我介绍了工作及环境情况：印刷厂的同志十多人住在村东边；报社社长赵宏弼带着电台、编辑部随区党委、军区行动，编辑部排出版面的《鲁南时报》由通讯班送来印刷厂，经抄写交给印刷人员用石印机印出，就送到站上来。我的任务就是直接在站上分发报纸了。

当时我只有16岁，脱离了大的集体来到这站上，这在紧张、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虽带着手枪、手榴弹却从来没用过，不免精神有些紧张。老蒲见我这种情绪，就说：在这里没事，印刷厂与上级联系极密切，通讯员天天两头跑，一有任何情况，他们马上通知我们，况且这里群众基础好，我们地形又熟，鬼子从白彦据点出来是瞎子。

这时，虽已过了惊蛰，山沟里的夜间却仍然寒气袭人。去冬发的棉衣是铁道游击队在枣庄西边铁路上劫了鬼子车厢的战利品，运进根据地，解决了这一年我党、政、部队一大部分棉衣问题。大家领了棉、布，妇救会发动村里的大嫂、姐妹们做成棉袄、棉裤。但是在当年的战争环境中，大家都是在谷秸、麦秸、野草上穿衣而眠，一个冬天过来，棉袄、棉裤都已磨破，棉花露在外边，立卧都是这一身。睡觉时，是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遮盖御寒。可是我既没有被子，又没有大棉袍，这夜，只有我们二人。老蒲脱下长棉袄，一人一半，互相抱着对方的腿和脚取暖。我却由于“内外夹击”久久不能入睡，“外”是露在外边的部分总是发凉，“内”更厉害，藏在棉衣缝里的虱子这时大肆猖獗，咬得我全身痒痒，如果在白天就可以抓一个消灭一个。这时却毫无办法，只能任它肆虐了。另外，还记挂着出去执行任务的交通员何时归来。这样一会迷糊一会清醒到了天蒙蒙亮。老蒲有些着急到村口的路上去看，下午印刷厂送来了一期新印出的《鲁南时报》，到了晚上交通员仍无一人回来，报纸发不出，送不走。正着急，厂方又派人通知，敌九十二军一部在我五团部分兵力和滕峰边县大队抗击下仍在步步紧逼，离此不远了，白彦据点的鬼子兵也在增加，情况紧急。印刷机已



经埋藏好，他们准备马上转移。脱离了印刷厂的同志们，我当时有些发慌。老蒲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走。我们这个站联系着南北交通。如果交通员来带着报纸文件和我们联系不到就糟了，况且今天的《鲁南时报》还没有发出，和我在一块不会有什么事。”随后向我讲了他在1941年日寇大“扫荡”沂蒙山区时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如何养伤躲开鬼子搜索的经历，令我倍加敬重，心中的不安稳定了许多。二人背靠着背包、报纸文件和衣而眠。因为情势紧张，谁也没睡着。这是我和老蒲度过的第一天。

次日，天刚蒙蒙亮，还没有来得及搞早饭吃，山南边几个村子里就有些老乡逃难过来，说“国民党二十九军进俺村了”。不多时，山北边也有些老百姓跑了过来，说白彦据点的鬼子出动到这边来了。此时，仍没有交通员回来。我们二人急忙背上背包和报纸文件，带上武器迅速向村南转移。我们知道，区邮局随鲁南区党委、军区在南边徐庄附近，而北边是白彦鬼子据点和公路，其他方向碰上顽九十二军的可能性大，弄不好就会进到他们网里。我们登上东南方的一个山梁上，天已经大亮了，只见北、西几个山头上已有些身穿黄军装的人在活动，分不清是日伪军还是顽军。附近一些村庄里和道路上“跑反”的老乡们在呼喊，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叫声，幸而东南方向还没有看到敌人的身影。老蒲带我跃下山岗，跑出不到五里地，只听到身后枪声大作，枪声、爆炸声响彻山谷，不知谁和谁交了火。当时，我只觉得浑身瘫软、两腿酸痛、头晕。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山沟里休息，老蒲一摸我的前额，说好象发烧。这时枪声越来越近，我赶紧支撑起身体背负着报纸、背包数十斤的东西，和老蒲继续走。路上，他数次要帮助背报纸，我坚决不让。他也背着不少的文件，又曾经负过伤，怎能再增加他的负担。中午时分，我俩爬上一座大山头，山顶上有个小村庄，从早晨没吃上东西，老蒲又饥又饿，我因发烧，只渴不饿，便在村头老乡家找了水喝。老蒲打开干粮袋吃了东西，随后，找来了一位村干部，对我说：“把你背的报纸存放在这里吧，你生着病再没法背着走了，这样会轻些。”我说：“那怎么成？这期报一张也没有发出，各地党政军机关、部队都等着看呢。”这期报纸登载着顽九十二军进入我鲁南滕峰边地区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他说：现在这么紧张，我们又没找到机关，先存下，回头再来取就是了，交通员对这里都很熟，群众基础又好，没问题。”我想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记下村干部的名字和村名，商定了来取报时的联络方法。村干部走后不到十分钟，我们正准备上路，村子里几个年轻人就向东跑了过来，喊道：九十二军已从西边上山来了，已到村西边。我和老蒲就不顾一切地向山下冲去，身上卸下了报纸轻松多了。刚刚到半山腰，一股九十二军的士兵已到了山顶我们休息过的地方，看见我们就喊“站住”！接着“叭叭”打来几枪，老蒲带我迅速进入一个山沟，敌人没有下山来追。经过这个山谷，我们继续向对面的山口爬去。当距山口还有十多米时，突然从一块大石头后边冒出一个当兵的端着一支步枪喝道“举起手来”！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下可坏了。由于视野开阔，我们二人谁也没有把枪握在手中。定神一看，这个人穿的好象是我们部队的军装，还是老蒲沉着，就问“你们是军区的吗？”经过一番盘问对答，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的心情就像重回到母亲怀抱那样激动，心里一震，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躺到地上，再也不想动了。他们找来水给我喝，老蒲继续与那位战士一面警戒一面交谈。战士讲：刚才见到对面山顶上去了一股九十二军的向你们开枪，就估计你们是自己人。还讲到我们掌握的九十二军的动向，最近几天我们五团和县大队打了几次阻击战，他们的大部队好象还没过来。军区



就在徐庄附近。他是警卫连派出的警戒岗哨之一。休息一阵后，紧张的心情去了一大半，告别了那位战士，我与老蒲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走着走着，头愈重、腿愈软，越走越艰难，背包被老蒲硬夺过去背在他身上，上山下山还扶着我。好不容易咬着牙爬过了七里河大山，路上遇到了几位我军的战士和地方干部，打听到了区邮局驻在徐庄南一个叫南山头的小村子。

到了区邮局天已全黑下来，见到王丹墀局长，我激动地直掉泪，一下躺到草地铺上。当听到老蒲向局长汇报一天来，我强拖着发烧的病体跟着他，翻了三座山，走了60多里路，避开日、顽，险些落入敌手时，王局长看我那难受相，急派通信员到几里外的军区司令部请军医来。当我以检讨的口吻讲了没完成任务，把这一期的《鲁南时报》存到山顶一个村庄里，老蒲也作了解释后，王局长还是有些生气，马上派了两名交通员带着武器，照我说的地址、村干部姓名，连夜去取报纸。不多时，军医来了，给我作了检查，试了体温39度，没有发现别的毛病，让我吃了几片药，又留下了一包药片。王局长又让管理员跑了几个村庄弄来了点挂面，让炊事员煮好还打了两个鸡蛋给我端来。领导的温暖、同志的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含着眼泪吃下去一半，而老蒲没有吃上我这“病号饭”被炊事员带着去吃别的饭了。事隔60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仍难以忘怀。因为当时根据地的百姓受战争、天灾折磨连糠菜半年粮都保证不了，还要支援自己的子弟兵抗战。而在部队里大家吃的是掺了百分之九十谷糠、高粱糠做的煎饼，或者是榨去油包含花生皮在内的花生饼啊！吃过挂面后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拂晓时两位交通员把报纸取了回来，原来九十二军只是从那个山顶路过，没有停留，那位村长是尽心负责的。

吃药休息后，烧渐退，觉得精神好多了。下午接到通知，九十二军对我已呈包围态势，傍晚要立即转移。黄昏时集合出发，路过白彦一费县公路时，在军区警卫部队掩护下顺利通过。由于我病未完全好，背包等全由同志们分担了，天明时到了费南崇圣庄附近一个村庄住下，蒲文学同志也一同到了费南。



昔日的天
宝山根据地

到费南后，区邮局立即派出三人小组通过日寇封锁线，到南洞一带建立联络站，接上了关系。蒲文学同志又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不幸的是交通员老李同志（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就在我和老蒲转移后被九十二军抓去，知道了他是八路军跑交通的，就严刑逼供，老李宁死不屈，最后被九十二军活埋。

撤到费南不久，军区派部队配合报社印刷厂的同志将石印机转运到费南一个山谷里继续印报。我继续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不久又经历了我军集中兵力彻底粉碎了九十二军大规模向我鲁南仅剩下的一小块费南的郑城、天宝山区根据地的进攻及后来消灭土匪刘黑七和大汉奸荣子恒部等的战斗、战役，以及对日寇的反“扫荡”，经历了锻炼和考验。到1944年初，鲁南各根据地已成了连成一片的解放区。

在我党领导下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中，蒲文学只不过是一名最普通不过的战士，记得他的人已不多了。在那异常艰苦、危急的时刻，他带着发着高烧的我冲破敌人的围堵找到军区单位，虽然仅仅两天相处的遭遇，却令我终生不忘。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曾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他忠厚诚实，对党和民族解放事业坚定不移，对工作任劳任怨，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牺牲、勇敢向前，在困难、危急时刻能沉着应对。所以他领导的交通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出色地完成过许多重要的任务。他对其领导下的交通员像兄长一般地关怀、爱护。对于他在战斗中负伤更详细的情况我后来曾问过他，他只回答：没什么。

我永远怀念着他。

题外话：

2004年，国庆节刚过，我去淄博市探亲时，借机去蒲家庄参观蒲松龄纪念馆，那蒲松龄的生平、作品、名人的题字、题诗等展览虽然引起我很大兴趣，心里却总惦记着打听已失去联系整整60年的蒲文学同志。参观完后，在纪念馆门前，询问多人后，终于有两位老人告诉我：“蒲文学是俺村里的老革命。年纪大了回到村里住了几年，前些年已故去，他的子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济南。”听后，不免非常惆怅……。再问一些具体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

（作者祖籍平邑县地方镇西瑶草村，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供职于北京市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离休干部）



回忆“抗日小学”

靖玉树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临沂的时候我还不到5岁。我的家在当时的沐水县青云区柳庄村。我们的村子是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沿。村西离鬼子据点只有两公里。由于鬼子常来扫荡，村里无法办学。八路军就在磨石沟（在我们村东一公里多）办“抗日小学”，1942年我便在该校报了名。那时上学的条件和学习的情景，是现在的小学生们永远也无法想像的，所以值得一写。

首先是学校没有房子。有一家住户因躲鬼子到外地去了，我们就在他家上课，不到一个月，住户又回来了。我们就搬到一个要饭的家里。上了两个月的课，要饭的又回来了。我们就搬到一个叫“陈坠子”的大土匪头子家里。因为那时土匪是很怕八路的，八路来了，他就跑了，在他家的房子里竟上了一年多的课。

其次是没有桌椅。用石块支起的门板当桌子，但也有几个长短不齐的小桌。正上着课，门板塌了。赶快在门板底下向外拉同学。黑板是在墙上泥了长方形平面，用锅门烟子染的，学生写字的石板是每个人从家里找来的破盆底。石笔是在石头塘里拾来的面石。

再就是教材缺乏。我刚入学，应念第一册，但无此册，只有一本第二册给了我。第二册只念了一半，来了第三册，我就抛下第二册，掺进第三册的组。但第三册只有两本，其中有一本是老师的教本。所以同学们只有一本，大家你抄完了我抄。第三



册念了不到一半，说来了第四册，来的很多，两个人可以摊一本。我和陈叔明两人一个小桌，把教材放在中间，他往那拉，我往这拉，光起矛盾。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用绳子量出桌子的中线，用刀刻上沟，将书脊对准沟。不久就来了第六册，这回我高兴了，因为每人都能得到一本。可惜是用粗火纸油印的。领到课本后，用鼻子凑上书页，闻到那油墨味，简直是一阵阵清香。谢天谢地，我可有一本完全属于我的书了。夜晚在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前，一晚上就学会了10课，那是一种十分幸福的享受。

我们全校只有46个同学，却是分布在不同的年级。分别称为：甲组、乙组、丙组、丁组。每个组有三种课，即：算术、国语、常识。4个组都坐在一个课堂里，由全校唯一的一名教师上课，这叫“复式教学法”或者说是“单级学校，复式编制”。总而言之是单师学校。往往正上着课，外边喊：“来汉奸扫荡了。”大家一齐争先恐后地跑，各奔各的方向。等平静了之后，学生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回来。

我们的老师叫靖汝衡，字峙湘（即现在靖志远将军的父亲）。他教学的热情很高，经常自己掏钱买奖品发给我们。别看这学校条件差，大家学的却热火朝天。有时一个多月没有课本，老师就编“补充课”，写在黑板上，大家抄。抗日的歌曲学了几十个，还排演节目，逢集的时候，我们打着小旗上街做抗日宣传，查“法币”（中央票）。有一次我查扣了我二叔的法币，二叔看到我带的小同学都拿着小旗。缓缓地把法币交出（但那是要用北海票兑给他的）。站岗、放哨、查路条，我们都干。

有时候，考试成绩好了，老师还发奖品。有一次我得了一只铅笔，这是最高奖，我激动得要流出眼泪。当然奖品是老师个人掏钱买的。

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就写“我长大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但又一想，到我长大了，鬼子也许早就被八路叔叔打光了，还打什么？于是接着说：“当然到我长大后就没有日本鬼子打了，那我们就打别的鬼子”。老师在本子上批了个“信口胡说”。那一次作文，我没得奖。

在我们的同学中，还有两个特殊的同学。一个叫杨学礼，他八岁时已经当了八路。1942年“精兵减政”时，他被减下来了，当时才11岁。因为他有三年的“抗龄”，有点骄傲。他学习赶不上我，但我也佩服他，因他会唱很多军歌，还会学马叫，叫得非常逼真。部队照常发军衣和餐票给他。据说，他是“抗生”。另一个叫诸葛顺，他是抗属，因他哥哥是八路。他是从鬼子占领的临沂城跑去的。

就这样，我们的“抗日小学”维持了将近两年。到了1944年，上级忽然来了通知，调我们唯一的老师上前线打鬼子。老师走了怎么办。上级说：改为“庄户学”。什么叫“庄户学”？就是同学们全部回家，一面打庄户，一面学习。由谁来教？上级说了：“识两个字的教识一个字的，识一个字的教不识字的”。我把小板凳一拿，就回家了。

我回到我们的柳庄，我在想：“我上了两年学，岂但识两个字，其实识的还多，我这不是可以当教师了吗。”我走门串户动员学生，不几天我们的“抗日小学”或者叫“庄户学”就办成了。我这个11岁的孩子就当教师了。虽然开学的第一天只有18个学生，但不久就到了两个班，我把男生与女生分到两个课堂里。也施行起“复式教学”来。学生中大小不一，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学习起来却比小同学笨得多。夏天在屋里上课，大家说热得受不了，要求到校外的沙滩上，找棵大树的树底下上课，我同意了。大家抬着黑板挂到大树的干楂上。挂得太高，我够不着。一个大龄同学叫解自焕抱着我做板书。我说“黑板要掉”。解自焕赶快把我放在地上，可巧黑板正砍在我脚上，皮也破了，血流不止。这时我这个冒充老师的小



孩，再也掩盖不住怯懦和娇气，眼泪就像打枣一样落下来了。同学们围上来，一面喊老师，一面哄我，这时我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上“失败课”。我们的学校办得其实很红火，还有校歌。校歌的歌词如下：

我们在斗争中生，我们在斗争中长大。我们是大众的子弟，集合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受着科学的教育，准备做新中国的栋梁。民主作风巩固了自觉纪律，自由思想发挥了创造力量。我们在一面学习，一面抗战，街头田地都是我们的课堂。在斗争最艰苦的年头，我们的歌声永远那样了……。同学们，同学们，抗战一定胜利，中华儿童一定解放……。

在全区“四四”儿童节大会上，我被选为“青云区抗日儿童团”团长。我们区有22个行政村，处在抗日的前线。

此后，村里办起青年识字班、妇女识字班、老年夜校，反正都是我教，青年中又分出一些是民兵。讲课时有来有不来，总难到齐。但几个经常到的人文化水平提高得都很不错。

1950年，临沭县（即原来的沭水县）召开“三模大会”，“三模”是指“办学模范”、“教学模范”、“学习模范”。在这次大会上，我荣获“临沭县教学模范二等奖”。

这些事情，现在讲起来像笑话，但我心里至今还热爱过去的那段童年生活。

抗日儒将安征夫

安 石



安征夫，原名安文弗，是杰出的抗战宣传鼓动家，八路军中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模范代表，是“九·一八”事变后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抗日救亡的典型人物。

毛主席为他改名

安征夫1914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一个进步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大哥安文萃影响下参加苍溪中学地下党活动。大哥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孙中山追随者，在川北推行新学的革命教育家，苍溪中学的创始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安征夫在苍溪中学加入少共，1934年在成都读书时由少共转为中共党员。他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和负责编印、宣传地下党报纸，1934年7月被通缉，逃回老家苍溪县，参加红四方面军。为逃避张国焘迫害地主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改名安问卜，任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宣传部宣传干事。1935年3月参加西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部宣传干事、红军大学教员。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受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领导，在长征途中为红军教书习字，培养干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宁胜利会师后，安问卜任红军大学庆阳步兵学校教员、文化主任。

1937年8月，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抽出一个团的干部，扩编成一一五师的教导大队，安问卜任政治指导员，在团长韦国清、政委陈明的领导下，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教导

大队扩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1937年8月后，安问卜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主任教员、学生队队长、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宣传股长，跟随八路军总部抗战在晋北、晋中前线。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和学习中培养我军抗战干部。1938年总部随营军校由山西前线调回延安时，安问卜、欧阳平、张正光三位年轻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很好奇地问安问卜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安问卜详细地向毛主席讲述了他在红四军亲身经历了张国焘迫害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惨状，为了隐瞒自己的地主出身，而谎称自己家庭从小贫寒，父母无钱看病，取了一个很封建很迷信的名字，即一生病就去占卜，求神保佑安康，还隐瞒了自己的高中文化，说是高小文化。毛主席说：“张国焘迫害青年知识分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个名字现可改过来了”。安问卜请主席帮他改个名字，主席应声抽了一口烟，转了一个圈，很沉重地说：“你三过草地，内，张国焘要迫害，外，国民党反动派要围追堵截，你真是一个从长征中好不容易才走过来的大丈夫啊，就取名‘征夫’吧”。安问卜从延安回到八路军随营军校驻地洛川后，即改“问卜”为“征夫”，此后他一直使用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安征夫。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8月后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正式公开命名为“抗大”六大队，安征夫担任政治处宣传股长，1938年12月安征夫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宣传科长，跟随何长工校长、周纯全副校长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晋东南，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一次东征。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安征夫跟随周纯全校长、李培南政委、韦国清副校长率抗大一分校三个大队（团），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从晋东南长途跋涉，开赴抗日最前哨——山东沂蒙山区，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二次东征。1941年安征夫代抗大一分校二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在沂蒙山区参加了大青山突围战斗和长期的“反包围”、“反清剿”、“反扫荡”游击战争。1942年随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滨海地区，先后参加了三次甲子山反顽战斗。

战斗在沂蒙

安征夫创办并主编了抗大一分校机关报《战旗报》，最早在平型关战役后的山西前线，他在八路军随营军校任宣传股长时创办校刊《锻炼报》，为纪念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改编为抗大六大队，又改名为《火炬》，后成为抗大一分校机关报，为纪念1940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又改名《战旗报》。至今珍藏在国防大学校史馆唯存一份《战旗报》真迹，头版头条就是他为皖南事变连夜赶写的社论《充分准备自己》。这份无论是抗战初期的《锻炼》，还是抗战中期的《火炬》，以及抗战后期的《战旗》，无论是在山西前线，还是延安，无论是晋东南还是山东鲁中、滨海，自始至终这份抗战的报刊都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莫大心血。

安征夫在抗大一分校，从延安东征到晋东南后，组织创办了抗大文工团，《沂蒙山小调》、《你是灯塔》、《滨海进行曲》等唱红全国的抗战歌曲就是他领导下的抗大文工团创作出来的。

安征夫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和抗大一分校大家公认的一大才子。老战友们回忆文章说，他抗战文章写得好，抗战校语写得好，抗战会议主持得好，抗战宣传鼓动得好，抗战演讲口才好。无论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还是抗大一分校，全校性大小集会主持司仪都是安征夫，这似乎是惯例。安征夫同志几乎每次在这种场面出现在台上。他总是站在台上，根据首长的讲话内容，利用间歇，适时地选用非常恰当的词语，把讲话重点集中起来，挥动拳头带领着全场呼出响亮的抗战口号，使全



场精神振奋，使会议显得生动活泼，进而把会议推向高潮。老战友叶尚志回忆录中说：“安征夫同志主持开会是决不可能有人打瞌睡，大家公认只有他有这一手本领，若是换另一个人主持，肯定要比他逊色”。这诚如安征夫老战友欧阳平将军为他所写的传略中说：“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水平、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方能做到，征夫每次都做得非常出色，给大家印象颇深。”他还经常主持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等首长来抗大一分校授课和讲话的集会，并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夸奖。

1943年初，安征夫先后任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部部长、滨海第一（滨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黎玉副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下，跟滨海军区陈士榘司令员、符竹庭政委，同滨海第一军分区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黎有章参谋长在抗战最前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整个山东的攻势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滨北军分区正处在胶济路东段，面对着日伪军占据的青岛、胶县、高密、诸城等重要据点。安征夫加强了我军灵活多变的抗战思想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增强了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山东那时以“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就是在安征夫领导下的滨海军区宣传部最先搞起来的。安征夫经常化装带队深入伪军据点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政治工作。开展反日本奴化教育宣教活动，与山东日本反战同盟著名日本干部金野博同志结交为亲密战友，在滨海军区开展对日伪军各种方式和类型的反战宣传，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加强争取伪军起义反正，特别是争取了伪军莫正民起义，又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1300余人反正。诸如此类的大规模伪军起义反正，强有力地破坏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他还参与指挥过诸日莒胶地区讨伪战役、赣榆战役，滨海反扫荡战役、临沂战役等著名战役。1945年5月1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全面性“扫荡”，安征夫主任带病同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率滨北军分区阻击从胶济铁路而来的日伪军。经过20余天奋战，5月下旬胜利地结束了反“扫荡”，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共消灭敌人5000余人，攻克了3140多个据点。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又基本上除掉了胶济路东南部日伪军。他们乘胜出击，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进攻敌占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胶济路上的重要兵站——胶县，切断了胶济路东段，直逼青岛。1945年10月在攻打诸城战役中，安征夫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回忆父亲宋日昌

宋 崇

今年3月18日，是父亲宋日昌诞辰100周年。面对父亲的遗像，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父亲常给我讲起的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故事，浮现在脑海，父亲几十年的谆谆教诲犹响耳畔，禁不住走笔行云，写出此文，算作对父亲百年的纪念。

战争年代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宋日昌从留学地日本赶回祖国，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抗日组织，从事对敌的宣传工作。当时阎锡山学八路军的建军办法，让薄一波组建由爱国青年组成的“新军”。党组织派我父亲去阎锡山的骑兵军，任“文司令”。母亲游云随父前往，主要做骑兵军军官太太们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了动员更多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父亲找到骑兵军驻地的



宋日昌1980年全家合影

地下党组织，会见了地下党的负责人，并将组织介绍信交给了地下党的负责人。“新军”发展神速，阎锡山担心山西被“赤化”，便开始制造所谓“清党”的白色恐怖，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叛变了，将父母的党组织介绍信交给了阎锡山，请功邀赏。这时阎锡山才发现自己所赏识的“文司令”原来是共产党，于是将我父母“驱逐出境”，即勒令离开山西。父亲打起行袋，声称去西安，然后悄悄地到了延安。

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之后，1940年春天，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北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我父亲任队长，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姚子健任副队长，带100多位干部前往苏北，沿途要经过国统区和日寇统治的敌占区，所以，所有干部都做了乔装打扮，我父亲佩上校军衔，其他同志则作为十八集团军的伤病员，名义是到后方疗完伤返回前线。我母亲抱着我当时刚满一岁的哥哥宋峻，扮成随军护士，照顾伤病人员。火车过西安时，国民党宪兵上车检查，我父亲镇定应付，宪兵检查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证据，就放行了。同志们都松了一口气，事后，我母亲才告诉姚子健，组织介绍信缝在我哥哥的小棉袄里，干部名单用油纸包裹着，藏在我哥哥的尿布里。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队伍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到达新四军四师彭雪枫的部队。

到达苏北根据地后，父亲在苏北行署从事民运工作。有一次下乡执行任务，当时是初夏时节，田间小路两边是一人高的“青纱帐”，父亲带着警卫班急步行军。他是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毕业的，走路很快，健步如飞，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而他是近视眼，艰苦的战斗生活，一副镜片早已破损，又无处配眼镜。父亲走得快，只有两个警卫员紧紧跟着，警卫班的其他战士已远远地落在后面。小路过了一座桥，有个急转弯，父亲转过弯，模模糊糊看见前面一支黄衣服的队伍，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兄弟部队，等走到跟前，听见他们说的是日语，再细看确是日军，而日本人看见走过来三个人，都穿着便装，以为是老百姓，也没注意。我父亲大叫一声“鬼子！”一下闪进“青纱帐”，警卫员反应极快，掏出“快慢机”（可以连发的驳壳枪）打了一梭子，两个鬼子应声倒下！枪声通知了后面的警卫班战士，立即进入“青纱帐”投入战斗。等被打蒙的日军醒悟过来时，新四军战士早已无影无踪，恼怒的日军朝庄稼地里乱放了一阵枪。

还有一次遇险是在苏北东台县的三叉河，父亲每次讲起，都要讲一个序幕——我哥哥宋峻刚学会说话，第一句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学着日军扫荡时三八大盖步枪的枪声。说也奇怪了，每次宋峻瞪着惊恐的眼睛，嘴里发出枪声时，准会碰上扫荡。一天早上，母亲刚给宋峻穿好衣服，宋峻的嘴里突然发出了枪声。说时迟，那时快，警卫员急步冲了进来：“快，鬼子来了！”母亲忙抱起宋峻，提着枪，要向外冲，警卫员忙阻止说：“来不及了，鬼子已经包围了村子。一大早，天还没亮，鬼子从河上偷袭来的，首长已带着机关撤走了。让我来接你们。”此时门外已传来鬼子兵的叫骂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显然已无法出门。这家房东是做猪鬃生意的，有间库房堆满了猪鬃毛，我母亲抱着宋峻忙躲进猪鬃里，警卫员又帮着掩盖严实了，才跑到厨房，翻起土灶口的砖头，把两支驳壳枪藏在砖下想出门去探听虚实。刚走到门口，日本兵已冲了进来，用刺刀对着警卫员的胸口逼问：“八路的干活，新四军的没有？”警卫员“啊吗、啊吗”地装起了哑巴，日本兵用枪托打，用军靴踢，警卫员就是“啊吧、啊吗”两个发音。日本兵对家里进行搜查，搜到猪鬃库房时，母亲紧紧捂着宋峻的嘴，生怕发出声响，宋峻乖乖地不哭也不动。日本兵大喊大叫，并用刺刀不停地戳刺，见没有动静，就押着警卫员走了。

当时此地是新四军的一处供应站，有被服仓库和后勤物资，这也是日本鬼子偷袭的目的。这时码头上一片混乱，日本兵押着一些老百姓，正从仓库搬运新四军的军布到船上，押解警卫员的鬼子兵，把警卫员押到船上。用抢来的军布，把警卫员绑在船栏杆上，鬼子兵忙着去执行别的任务时，警卫员对船民大姐悄悄地说：“我是新四军，乘鬼子不在，快放了我！”大姐机警地给警卫员解开绑，警卫员混在扛布的民工里，跑上岸，乘鬼子兵不

注意逃了出来。回到房东家，他从灶口砖下取了枪，陪同母亲抱着宋峻，从村后撤出，追赶机关队伍去了。

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父亲是个严父，他既有中华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道德准则，又有开放的教育思想。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六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都很顽皮。平日里父亲工作很忙，不可能盯着管我们，但若父亲发话，那问题肯定很严重，父母的基本教育原则是“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我记得的第一个故事，是在山东临沂新四军部。我刚读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课，老师讲课讲到一半，我突然站起来说：“老师你别说了，让俺们玩一会吧！”老师当时目瞪口呆，这事还被反映到山东省教育厅杨厅长（杨希文）那里。那时我们家和杨厅长家住一个大院里，杨家院子里有枣树，我经常去偷枣吃，杨厅长不但不骂我，还给我拿枣吃，说以后想吃就来要。父亲知道我“偷枣”之事很生气，杨厅长却说，淘气的孩子聪明，又告诉他我在课堂上的事，父亲更觉得我不像话，杨厅长说：“孩子不爱听，说明老师课讲得不好，要他别开口罗唆啦。”一席话把父亲说乐了，以后成了家里的笑话段子。

当时临沂有庙会集市，十分热闹。一次，8岁的哥哥宋峻带着我到城门口去逛集。父母很生气，把我哥哥用绳子捆起来，要狠狠教训一顿，我看情势不妙，就逃走了。父母教训完哥哥，发现我人不见了，就在大院里四处找。在会议厅门口，里面陈老总正在开干部会议，门口站了不少警卫员，我父亲上前询问：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有名警卫员告诉他说：会议厅里有孩子。当时陈老总在作报告，一张方桌上铺着一条军毡，我正钻在桌子底下玩，因有军毡遮着谁也没有看见，等我玩累了从桌下钻出来，对陈老总说：“我渴，想喝水。”陈老总摸摸我的头，把茶杯递给我继续报告，我端起杯子就喝，喝完又钻到桌下去玩。父亲听了警卫员这么一说，大惊失色，忙敲开会议室的门表示歉意，并从桌下领出我。陈老总看我父亲一脸怒气，关切地问怎么回事，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陈老总对父亲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有什么问题要教育、开导，打骂不是好办法，今天就不要再打孩子了！”就这样，我免掉了一顿打。这段故事后来还被收在《陈毅传》中。

在和平年代里，父亲常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要我们不要当八旗子弟，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成为败家子。父亲一再告诫子女们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搞特殊化，相反要更努力，更严格要求自己。

1949年在合肥时，父亲是皖北行署主任，母亲是合肥市宣传部长。大姐和二哥当时已读高中，在学校一个是团干部，一个是学生会主席，学校搞国庆庆祝活动，要演活报剧，需要用道具手枪，二哥宋峻就从家中警卫员处借了一支驳壳枪去学校演戏去。父亲回来，知道此事十分生气，立即派警卫员去学校追回枪，还叫回大姐和二哥，狠狠地批评，告诉他们演戏庆祝这是好事，但不能违法、犯纪律，枪是不能随便借人使用的，万一丢失或出人命会酿成大祸，“不能因为你们是我的子女就有特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培养我们有平民意识和劳动观念，父母在寒暑假让我大姐、二哥和表姐去勤工俭学，劳动锻炼——记得二哥和表姐是去电影院当售票员和领位员，表姐是去女子浴室当服务员、会计。

为了培养我们自立自强的精神，我们七个子女从小学到大学，全是住校寄宿。我读初中时，每月有十几元伙食费和零花钱。为了节约，我们经常从上海中学步行到徐家汇，省下零用钱买文具和看书，每月总有节余，还存银行，养成了我们理财的能力。

父母对自己和家人克勤克俭，但对同事、朋友经常慷慨解囊相助，保姆、警卫员或司机家有困难，父母都会给予接济和帮助。



我从小学到读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甚至合身的衣服，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是穿父亲的旧衣服，就是穿哥哥的旧衣服。父亲体型较胖，我穿他的衣服如同布袋装个木棍子，四处晃；哥哥们高大，我的袖管、裤腿常要卷二三圈，裤子的臀部、膝盖头、衣领处总是干干净净的几块补丁，全是姥姥亲手给缝补的。我每每心里想不通：一个副市长（上海市）的儿子，穿这种衣服，很是丢人。但父母每次总是说：你勤俭节约是光荣，别去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学习、比工作、比贡献。不然就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这补补缝缝的三年准是我。直到我考进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父亲才用家里旧的墨绿色绵绸窗帘改做了一件中式棉袄罩衫，我才真正有了自己“出客”的衣服。

20世纪60年代，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建设，当时安徽老家一位表兄弟到上海来找父亲，希望能得到照顾和帮助，因为我父亲在市里分管这项工作。父亲告诉他：“去新疆锻炼，建设边疆是好事，支持你去，但别的照顾是没有的，我送你一件礼物，给你改个名字，叫杨自立吧！”这个表兄弟欣然接受，到新疆后发奋努力，后来还成为书法家。

父亲很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特别在和平时期，建设祖国必须要有一技之长，把七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这应该说取决于父母的坚持。

二哥宋峥1950年参了军，参加了抗美援朝。1960年复员后，他被分配在东北一个县城当了中学校长，也成了家，有了孩子。父母认为，当时他参军时只读到高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是对的，但现在复员了，必须完成学业，不然以后经济、科技发展了，就跟不上形势，会被淘汰，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有一技之长。经过反复劝说，二哥终于来到上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看到30多岁的二哥每天一大早起来背英文单词，看到嫂子思念的家信，很感心酸，认为父母有些过分。后来二哥考上了北京外贸学院，退休前是山东外贸局的局长。

四哥宋岚读高中时游泳成绩很好，蛙泳200米得到上海市中学生第一名，上海市队（竞技指导科）要吸收他为正式队员，四哥认为当了运动员就能挣钱，就能自立，就去了运动队。父母知道后，反复做他的工作，告诉他运动是好事，但学业不能放弃。要他坚持边学习，边训练。后来，四哥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分在市六医院，成为陈中伟断手再接的助手，还担任了上海卫生局的团委书记。“文革”中，他遭受迫害，在狱中含冤去世，最后用鲜血在墙上写下“打倒江青”四个大字。

父亲是个大孝子，教育我们孝敬老人。我们工作以后，父母要我们自力更生，不准“啃老骨头”，要我们每人每月交家里15元钱（当时月收入54元），参与支付家中的水电费和伙食费。一些叔叔阿姨知道后还说过他们：“你们又不缺这点钱。”但父母认为这是培养儿女的孝心和赡养老人的习惯，其实他们一分钱也没用，全用我们的名字存在银行里，等我们结婚时再拿出来作为结婚费用——这是父母的良苦用心。

父亲晚年给我们每个子女写了一幅字，算是示儿家训。给我写的是：“崇儿，不但要导演好自己的一生，还要导演好你儿子宋晴的一生！”

现在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和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成为八旗子弟，全成了报国为民的有志之才！



王献之被公主抢亲后的悲惨人生

紫衣飘飘



王献之休郗道茂续娶新安公主图（明·唐寅）

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最小的儿子，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与父亲齐名，后人将他们并称为“二王”。

他才华横溢，洒脱不羁，风流俊雅为一时之冠，而且相貌堂堂又重视风仪修饰，有着世家子弟精致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一个人，被新安公主暗恋也就不奇怪了。

新安公主司马道福是晋简文帝的女儿，她钟情王献之久矣。可惜她已经嫁给了桓温的儿子桓济，后来桓济欲篡兵权被废，新安公主就势与他离了婚。

依旧年轻貌美的公主，终于有了追求幸福的自由。

原本，这也该是一段佳缘。只是，王献之已经娶妻郗道茂，并且夫妻感情甚笃。郗道茂是名门世家女，王羲之是郗家的东床快婿。

郗道茂端庄娴静，才情兼备，是个颇具生活情趣的女子，又是王献之的表姐，两人自小相识，青梅竹马。长大后，家人为他们办了婚事。王献之对仕途不很热衷，加上父亲置办了大量的山林田产庄园，生活颇为富足，得此贤妻美眷后更加淡泊名利，只愿流连山水，清静度日，潜心书法造诣。

在新安公主看来，郗道茂虽是明媒正娶，但是一直没给王献之留下子嗣，只生了个女儿，且已经夭折。妇人无子，就是可以被休弃的，自己以金枝玉叶的尊贵身份和他结亲，王献之一定欢喜。于是，她苦苦向皇太后央求。

东晋皇室也颇为认可王献之的人品声望，皇太后就做主让孝武帝下旨诏命王献之为驸马。

显然，新安公主低估了王献之对妻子的情义。

那是一个平静的日子。一封令王献之休妻再娶的圣旨，打破了王家的平静。小夫妻情深意重，恩爱缠绵，早就约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从没想过今生要生别离。可这次，他们遇到的不是死生契阔，他们遇到了皇权，无法抗拒的皇权。

王献之默默看着妻子落泪，一个人走进了书房。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让大家惊异的是，第二天一早，王献之走出书房，已经变成了跛足。他不舍得离开妻子，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来抗旨。无奈之下，竟用艾草烧伤了双脚，落下终身残疾。

抱住丈夫，郗道茂泪下如雨，丈夫的每一丝疼痛，她都感同身受。她不忍。

平日里，一根头发都要理得一丝不乱的丈夫，对她要有多么深的感情，才会狠得下心来自残？

艾火烧灼，他的心却如此平静。如果可以把爱人留在身边，这点伤痛又算什么呢？他扶着她的背说：“不哭，我们不用分开了。我现在一个残疾之人，怎配做驸马？”

显然，王献之也低估了新安公主对他的情意。她很轻松地说不在乎，即使他瘸了，她也要嫁。

王献之彻底绝望。

郗道茂走了出来，手中挽着一个包袱。轻轻地说：“献之，我走了，我不许你再伤害自己。”

“不要！”如果从此生活中没有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去见公主，她为何要生生拆散我们？即便把性命丢在金殿上，又有何惧！”

郗道茂拉住了他：“不要啊，献之。这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死。如果为此惹怒皇上，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灾祸。”

对这种重情守义的性情中人来说，为爱抛弃生命并不难。可他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他肩负着太多的责任，太多的重担。

她乘船离去了，他能做的，只是隔河相望。此时她的娘家已散，只好去投奔叔父。王献之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模糊，悲伤得不能自己，虽生犹死一般。她已经没了父亲，没了女儿，现在，她又没了丈夫。从此后，孤身一人寄人篱下，这日子让她怎么活下去？

郗道茂被休回去不久，就郁郁而终。听闻此讯，王献之心如刀割，被伤心愧疚折磨了一生，到死也没有原谅自己。

造成这个悲剧的，就是那个现在做了他妻子的人，新安公主，他对她充满怨恨。

可想而知，新安公主费尽周折抢到手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对她没有丝毫的情义，表面上的恭敬客套透出丝丝寒意。可他毕竟是她爱慕崇拜的人，做他的妻子，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她亦知足了。

后来，王献之又纳了一房小妾桃叶，整日里和她郎情妾意，好像还生怕天下人不知道，常常用诗词唱和的方式与她大秀恩爱。

桃叶出门一趟，王献之都要亲自迎送到渡口，还写诗送给她，现在南京还存有“古桃

叶渡”的石碑，成了他们情意的千古见证：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也作诗答和，从此就甜蜜蜜的称他“团扇郎”。

新安公主明白，这是他无声的反抗。她的心中全是苦涩，可这杯苦酒是自己酿下的，她也只能抵死饮下。曾经骄纵的公主，因为深爱而顺从包容。她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更没有回到娘家告状诉苦。她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维护着夫君，让他婚后青云直上，官至中书令。她希望终有一天能感化丈夫，真正得到他的心。

桃叶是个聪慧多才的女子，可也只是郗道茂的一个影子，更是王献之向世人表示愤怒不满的道具。王献之心中放不下的，始终只是郗道茂。流传至今的几个书法帖子中，都流露出王献之对前妻的思念爱恋之情。

《思恋帖》：思恋，无往不至。省告，对之悲塞！未知何日复得奉见。何以喻此心！惟愿尽珍重理。迟此信反，复知动静。（《淳化阁帖》）

《姊性缠绵帖》：姊性缠绵，触事殊当不可。献之方当长愁耳。（《淳化阁帖》）

《奉对帖》：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悵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唯当绝气耳。（《淳化阁帖》）

大意是：我们分别这么多年了，回忆起来，我今生最幸福的时光还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竟有分开的一天。

你的一颦一笑占据了我心，想要忘却，却终不能忘却。你离去越久，我愈发沉湎在对你怀念中不能自拔。难道，这伤悲痛苦，一直到死才会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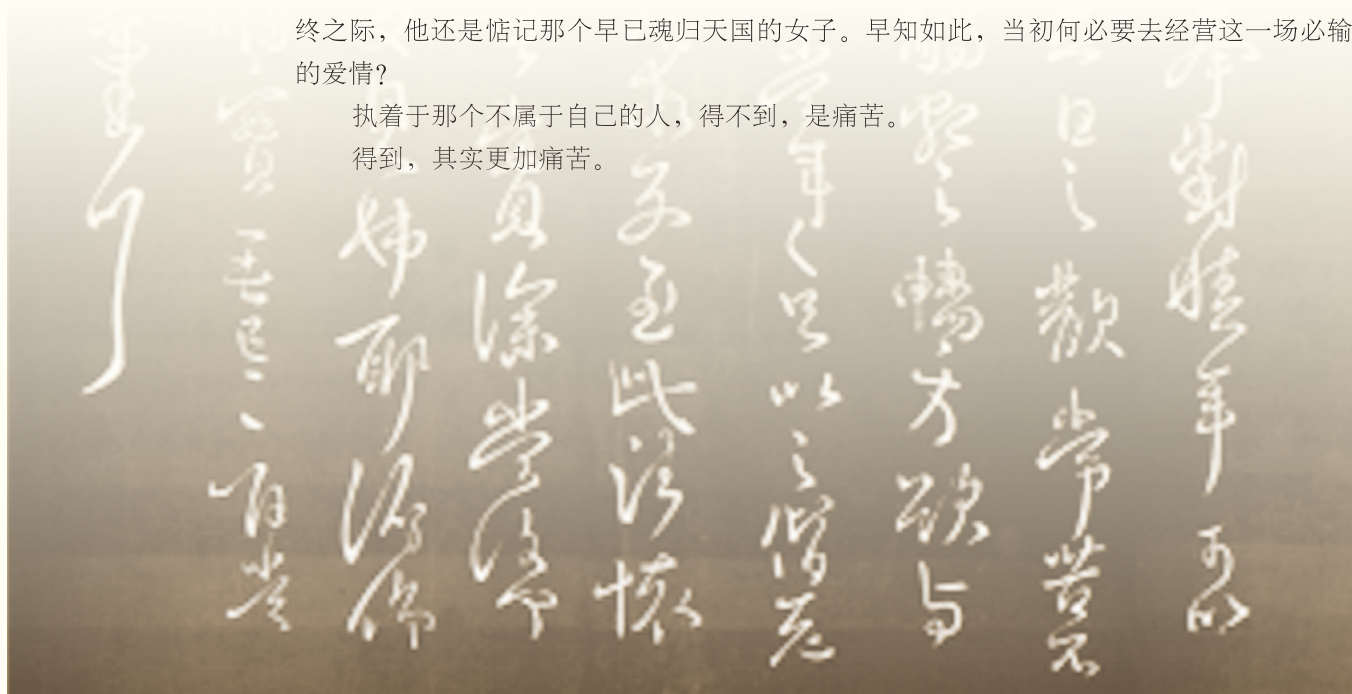
王献之四十一岁那年，才和新安公主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神爱。对郗道茂的思念和愧疚拖垮了他，两年后，王献之去世。

这个杰出傲世的男子，生来仿佛就要处在那万人中央，享受着万丈荣光。可偏偏，因为自己的杰出，换来了半生伤痛。

《晋书》记载，王献之临终之时，做法的道士问他平生有何憾事。他说：“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新安公主的心，在那一刻突然明澈。她用了一生来爱他，终究得不到他一丝情义。临终之际，他还是惦记那个早已魂归天国的女子。早知如此，当初何必要去经营这一场必输的爱情？

执着于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人，得不到，是痛苦。
得到，其实更加痛苦。



“山东水库之母” ——石泉湖水库

魏贤胜

2014年是“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水库建库70周年。为了隆重纪念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当年曾经带领全村修建这座水库的莒南县石泉湖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义丰的二儿子李全彬于9月13日来到临沂我的家中。全彬对我说：“明年是石泉湖水库建库70周年，我和县里、镇里有关领导商量后，准备编一部纪念文集，前些日子我已经去县、市和省里收集了一些资料，拜访了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回来后初拟了一个《石泉湖与“山东水库之母”》文集的大纲。你对莒南和石泉湖的情况比较熟悉，又在国家水利电力部展览办公室搞过多年展览，从市史志部门退下来后，一直在做文史书籍的编纂工作，很有经验，你一定会给予我们很好的指导和帮助！”

我从全彬的手里接过编纂大纲，当看到李义丰的名字时，一股热流顿时涌遍了全身，眼里的热泪也禁不住夺眶而出。这是由于我想起了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那个年代所创造的不朽业绩，那个年代带领人民创业的真心实意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公仆！今天他们的后来者能够编纂一部文集，永世流传，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怎能不使人感到敬佩和激动呢！这真是“缅怀千秋业，心潮逐浪高”啊！

在我退休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在为市委编纂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沂蒙颂歌》书库和为市政协编纂《光辉的历程》、《沂蒙山区好地方》、《临沂地域文化通览》等文史丛书，并有幸为《怀念薛亭》、《怀念严立乾》、《全国农业劳动模



范厉月举》、《厉月坤与厉家寨》等纪念文集担任主编或顾问。在数以百计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撰写的一篇又一篇怀念文章中，使我们看到这些革命先辈们应该歌颂、应该弘扬、应该传承的宝贵财富确实是太多了，他们为后人留下的用心血和汗水所开拓、创造的众多光辉先进典型，如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的莒南县厉家寨、高家柳沟、王家坊前和国务院表彰奖励的石泉湖等等，将会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创造新的业绩。对于“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水库，作为今天我们建设绿色农业、建设生态环保型社会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莒南县石泉湖村在抗日战争年代的1943年时，是一个只有28户、123口人的穷山村，全村共有300亩贫瘠的山岭薄地，好年景亩产也不过130斤左右。这里的人们不但缺衣少食，而且连基本生活用水都很困难，曾有“石泉湖，真可怜，涮锅水，用三遍！”的歌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村农救会会长、党支部书记李义丰于1943年春天带领全村40个劳力开山劈石，筑坝砌堰，终于在一条山峪里建起了一座小型水库。然而就在建成后的这年夏天，一场山洪把这处石坝冲垮了，一点水也没有拦住。面对这一挫折，李义丰等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接着再干，又用了—个冬春，在原来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更高、更宽、更坚固的大坝，并开凿了一条溢洪道，终于建成了这座能容水200立方，被后人称为“山东水库之母”的小型水库，开创了全县、全区乃至全省蓄水工程建设的先河，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全村群众和驻村八路军领导机关首长和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以及战士们的吃水、用水困难。

建国以后，在互助合作运动的推动下，治山治水，封山造林，改土造田，发展生产，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群众运动全面展开，中共莒南县委、县人民政府紧紧抓住石泉湖这一先进典型不放，下大力气进行不断培养、巩固和提高。时任县委书记的薛亭、副书记严立乾等经常来到石泉湖，与李义丰等基层干部具体研究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计，在他们亲自帮助实地勘察、规划、决策下，石泉湖于1953年建成了第二座水库，1954年和1956年又相继建成了第三座、第四座水库，被称为“四库连环”，从而使石泉湖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面貌，使水浇地面积达到80%以上。1956年全村粮食单产比1953年增长1.5倍，人均收入增长1倍。林牧各业生产随之获得了连年丰收。正如《大众日报》在1956年12月31日的头条新闻中所说的：“石泉湖变成有粮、有棉、有柴草、户户有零花钱、吃水便利、瓜菜满园的美丽山村了。”该报为了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石泉湖这一山区建设典型经验，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连续发表了《给石泉湖贺喜》和《向石泉湖学习》两篇社论。1956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石泉湖“全面开展山区生产的榜样”的锦旗，1957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石泉湖“是水土保持的榜样，是山区建设的典范”的锦旗，直至1966文革前，十多年来一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先进单位。早在战争年代获得滨海地区劳动模范称号的李义丰同志，1952年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1957年获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之后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

1956年秋，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陪同国家民政部部长谢觉哉到石泉湖村视察时，走到石泉湖第一座水库时说：“这是山东省第一座水库。”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在石泉湖村召开全省水利建设现场会时，舒同同志亲笔写下了“山东水库之母”六个大字。建国后曾到石泉湖村视察和指导工作的有彭德怀、邓子恢、杨得志、谭启龙、钱正英、张高丽等党、政、军负责同志，对石泉湖的水利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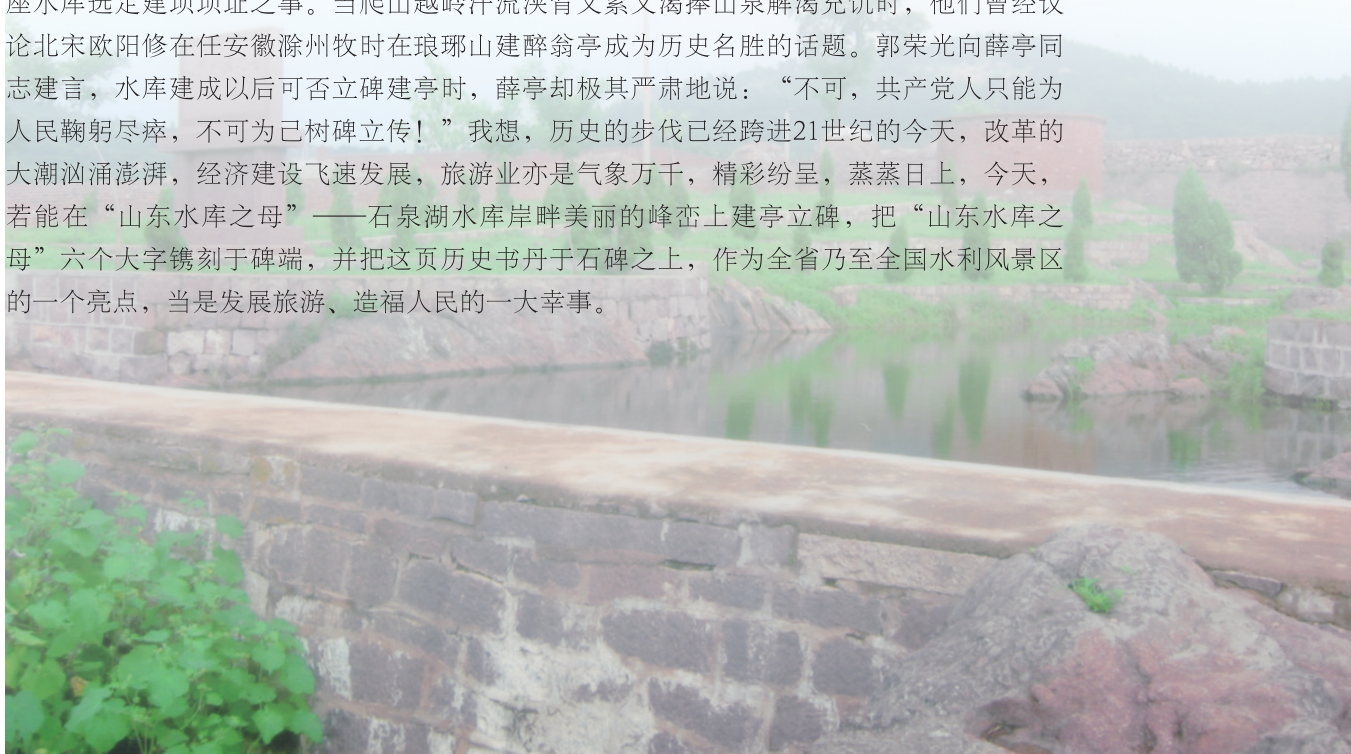
典型的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956年10月以后，薛亭同志由莒南调到临沂，担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书记，更是义无反顾地以石泉湖为榜样，团结带领地委一班人，广泛发动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干、苦干、拼命干，掀起了轰轰烈烈、规模浩大的治山治水高潮，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一鼓作气，相继建成了11座大型水库，13座中型水库，1000多座小型水库。仅库容量达1亿多立方米以上的岸堤、跋山、

沙沟、会宝岭、许家崖、唐村、青峰岭、小仕阳、陡山、田庄、日照等11座大型水库，就控制流域面积7352平方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128.39万亩，谱写了一曲曲“愚公移山”的胜利凯歌，实现了沂蒙人民千百年来“北国变江南”的壮丽梦想，1965年临沂地区被评为全国先进地区，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从1954年至1970年在山东工作了16年之久。1998年我和薛亭同志的女儿薛宁东主编《怀念薛亭》文集一书时，他亲笔为该书写了“怀念薛亭同志，立愚公移山志，做改造自然人”的题词。该书的“往事回忆”第一篇文章发表了伟萍、宁珂对谭老专访的文章。谭老十分沉痛地说：“薛亭是省委当时培养的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55岁就过早去世，非常惋惜。”接着，他肯定地告诉来访者：“薛亭同志是有功之臣，对临沂地区改变落后面貌是立了功的，莒南县石泉湖水库是全省第一个小水库，薛亭同志就是按这个思路把临沂地区的治山治水搞起来以至推广到全省去的。”1997年谭老再次来到临沂，看到一座座明珠般的水库，周围群山环抱，万顷碧波荡漾，山清水秀，尽收眼底。物换星移，山水仍在，感慨万千，他动情地说：“当年我到临沂时，薛亭同志陪我几乎跑遍了沂蒙的山山水水，这都是临沂地委带领全区的干部群众修起来的，至今仍然受益，薛亭同志功不可没啊！”

今天，在将迎来“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水库建库70周年的时候，我们十分痛惜的是那些创建并大力宏扬这一划时代的先进典型的先辈们，都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李义丰同志逝于1968年，享年57岁；严立乾同志逝于1978年，享年52岁；薛亭同志逝于1979年，享年55岁。他们三位在人世间都没有度过一个“甲子”，可谓英年早逝。我在2003年11月1日《临沂日报》上发表的《从怀念薛亭到怀念严立乾》一文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那些人民的败类，国家和社会的蛀虫，必定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和唾弃，而那些人民的公仆，真心实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功臣，必定会受到历史的褒奖和赞颂。”李义丰、严立乾、薛亭这三位人民的功臣不正是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永远褒奖和赞颂的楷模吗！

我的同乡好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郭荣光先生在为《怀念薛亭》文集撰写的《高山仰止》一文中，曾经记述了他当年在石泉湖村驻点时他和薛亭、李义丰两人在为石泉湖第四座水库选定建坝坝址之事。当爬山越岭汗流浃背又累又渴捧山泉解渴充饥时，他们曾经议论北宋欧阳修在任安徽滁州牧时在琅琊山建醉翁亭成为历史名胜的话题。郭荣光向薛亭同志建言，水库建成以后可否立碑建亭时，薛亭却极其严肃地说：“不可，共产党人只能为人民鞠躬尽瘁，不可为已树碑立传！”我想，历史的步伐已经跨进21世纪的今天，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旅游业亦是气象万千，精彩纷呈，蒸蒸日上，今天，若能在“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水库岸畔美丽的峰峦上建亭立碑，把“山东水库之母”六个大字镌刻于碑端，并把这页历史书丹于石碑之上，作为全省乃至全国水利风景区的一个亮点，当是发展旅游、造福人民的一大幸事。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跑接力海鲜早上市 走单帮山果赶时节

临沂城离海虽然只有100公里，但是过去市民很少能吃上海鲜，吃的大多是干咸的海货。盖因交通不便，运输工具落后。过去“下东海”运海货的都是用木独轮车，运来的大多是咸鱼虾皮等，而且非常艰苦。北路是跑岚山头的，要经过九岭十八坡，推车者苦不堪言。南路是跑青口的，道路更是难走。后来人们为了尽快运来海鲜，就想了个“跑接力”的办法。

跑海鲜“接力”一般八九人一组，称为一帮。第一人在江苏赣榆县青口海市等候渔船靠岸后，马上买上百十斤海鲜，分装两个蒲包，用扁担挑着往回返。到欢墩埠，第二站接着再跑，然后经石榴树、蛟龙汪、夏庄、重沟，至玉皇庙为最后一站，接挑者直奔城南关，进东哨门至旧粮食巷西首路南的海鲜市。买海鲜的人早已在此等候，这海鲜成本很高，价钱自然也很贵，一般居民是吃不起的。这海鲜是一夜时间即到达临沂，故是十分新鲜的，有时运来的虾蟹还是活的。

海鲜的品种也是随季节的变化而不同。正月春节前后是石头鱼（小黄花鱼），元宵节是德胜鱼（凤尾鱼），二月二可吃黄鲫鱼，清明节则是对虾和蟹子，端午节为春鱼（黄花鱼），六月六尝鲜刀鱼，以后天气渐热就不能跑



民国时期卖
山果的小贩

海鲜了，直到中秋节前后。秋季跑海鲜，运来的都要加一个秋字，如秋鲫鱼、秋蟹子、秋黄花……运到初冬也就停止了。

这种运海鲜的方法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临沂有了自行车才得到改善。自行车可以一个人跑单帮，一辆车能带100斤海鲜。当然也是十分辛苦，如跑北路的路过九岭十八坡时，有的坡很陡，自己推不上去，就找路旁专替人拉车帮忙的，给点好处费。自行车结束了“跑接力”的时代。

自行车运海鲜坚持的时间很长，但战乱时也经常中断。1948年解放后才开始正常运行。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临沂成立水产公司，由汽车运海鲜，在新市场设立了水产门市部，使广大市民都能够吃上海鲜，从此结束了用人力运海鲜的历史。

临沂过去称果品市场为山果市，因为各种果品大部分产自山区。这山果市位于观音阁外路东。最早上市的是樱桃，多产自蒙阴和沂水，接着是山杏和桃，杏多产于费县，桃多产于兰山县茶叶山，黄梨产于费县（包括现在的平邑）葡萄也是费县塔山一带产的最好。这些属于鲜果。临沂的干果亦很有名。栗子多产于郯城、莒南和费县，核桃盛产于费县（包括现在的平邑）。柿子虽是鲜果，但大都制成柿饼，因此也列为干果。大枣本地区产量不多，多由黄河以北的商贩运来。菱角和荸荠大部分是微山湖所产。最贵的是所谓南果，即南方产的水果。直到1930年才从新沂（当时称新安镇）用汽车运来部分南方水果，桔子、橄榄、香蕉等，但价钱昂贵，至于岭南的荔枝、桂圆、菠萝等是无法运来的。

本地的山果的运输大部分是肩挑，特别是黄梨、葡萄等，其他干果则可用木轮车运来，这些卖山果的一般是跑单帮，一个人就可经营。

因为果品的上市是有季节性的，故此山果业的人们还经营别的山货，如山花椒、金针、蘑菇、木耳等。1956年合作化后，它们称为“五果组”。市场改在新市场也就是后来的东方红市场。如今山果、干果、南果随处皆可买到了。

芦花市冬令兴旺 清真巷回民生意

过去南门外的大街叫南关大街，在中段有一向西去的街巷名叫芦花市街，此街甚长，中段南侧有一巷斜着向西南延伸，叫做斜街子，其末端有一大庙广济寺俗称老母庙，庙旁有一庵称华严庵。这芦花市街是逢五排十的南关大集的一个重要市场，从微山湖运来的芦苇和芦花皆在此街销售故称芦花市。旧社会穷苦人穿不起棉鞋，到冬天都有买用芦花制作芦花鞋（俗称芦花翁）穿着过冬。此鞋既可当棉鞋不冻脚而且下雪天穿上还防滑，在雪地行走甚是方便。这芦花鞋皆是本地人制作，分男鞋、女鞋（小脚穿的）和童鞋，所以说是冬令的一项重要商品。

这芦花市街东首是销售芦花和芦花鞋的市场，西首主要是销售芦苇的市场，芦苇主要是卖给居民做建筑材料，生意十分兴旺。这芦苇是一年四季皆经营，芦花主要是秋冬两季经营，春夏两季就卖各种草鞋。夏季因为没有凉鞋，人们只有买双草鞋穿着凉爽，特别是有脚气的（脚癣）更要穿草鞋，还有办丧事的男女孝子皆要穿草鞋。因此这芦花市又是卖草鞋的市场。男鞋称草鞋，女鞋则称“窝子”。

芦花市街中段路南有一小关公庙，正对着小庙有一哨门，向北便是油坊巷了。此巷北首是几家油坊和酒店，生意甚是红火。南端是出售各种草编和柳条编的市场，其中有篦子、簸箕、筐子、斗、箢篱、柳条帽（煤矿工人用）、提篮等，草编多为草帽和各种编织品。

还有一种编织品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器具，那就是篓。它是用腊条编制而成，内外皆用猪血糊上桑皮纸，有的还在外层涂上桐油，它是装液体的重要器皿。酒、油等液体商品都要用它装运。因此酒店油坊和酱园皆要用它，酱园用它装运酱油、醋、酱菜、豆豉等产

品。它既轻便又不怕碰，故普遍都用。它的市场在芦花市巷东首向南路东。随着塑料等器皿的普遍使用，簋这一器皿现在已消失了。

南关大街的最南端是观音阁，其西侧是山陕会馆，会馆的西侧则是清真寺。由寺向北直到“彤管扬辉”的旌门。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回民，他们同住一条街同饮一井水（井在清真寺内称“回民古泉”）。他们大多经营小本生意，但也有大的商户。如旌门里路两旁的皮行，这皮行为一许姓经营，生意甚是兴隆，货物销售范围东到江苏赣榆，西至河南商丘，南至徐州，北至青州。皮行的生产完全是手工制作。它还收购牛皮再将熟好的牛皮出售，这是临沂当时百人以上的作坊，也是唯一的一家皮行。回民经营的大多是各种食品，其中面食比较有名，如锅饼和千层饼等。由于是用素油制作，故很受广大居民欢迎。肉食多是制作烧牛肉、酱牛肉，别具风味。精制的牛髓油茶是冬季最受市民欢迎的食品。

糝作为回民的早餐由来已久。因此南关回民的牛肉糝远近驰名，至今依然是临沂的名吃，现代又增加了羊肉糝、鸡肉糝等，也很受欢迎。

阁子门外的几个回民羊肉汤锅，既实惠又便宜，而且汤尽喝，故最受乡村进城赶集人的欢迎。回民制作的糕点和馓子，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远近各回民村的居民皆来此购买。

回民的手工艺品亦是非常精致，其中有各种皮革制品，主要有各种农具用品和生活用品，如各种皮套，装旱烟的烟包等。再就是各种牛骨制品：骨别子、骨耳控。还有娱乐的骰子、骨牌、骨牙签、骨荷包档，皆雕得十分精致，可惜的是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手艺已经失传了。

三义庙刻印年画 白衣庵精制素斋

临沂城印制的木版年画虽不如天津杨柳青和潍坊杨家埠有名，但在本地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临沂城的木版年画起源于清雍正年间，当时居住在南城门瓮城的几户居民每年皆去潍坊贩卖年画，知县李方膺知道后，告诉他们要自己刻印年画，并亲自给绘出图样，从此瓮城的三义庙内就设了刻印年画的作坊。

刻印年画所用木版是用的费县产的老梨木，所用颜料也是本地土产。红色是采用农村种的一种叫“红”的植物，所用蓝色是一种叫做“蓝”的植物。每到夏季还要收购国槐的种子“槐连豆”制做黄色。这样三原色都有后，就用红黄配制绿色，红蓝配制紫色，黑色



年画作坊

是用墨块磨用，只有纸是从安徽买来的棉连纸。

年画的内容大多是神仙和吉祥游戏画。神仙画有：灶王爷、财神、门神、牛王、蚕神等。吉祥画大多是：连年有余、富贵吉祥、四季平安等。供人游戏的有：赶凤凰、水浒叶子等纸牌。最有趣的是几手字：长贴的是“消寒图”。上面画了一株梅花树，树生九枝。每枝上有九朵梅花，并注上从一九到九九。居民买来后从冬至开始染，每天将一朵梅花染上红色，染完九朵后再开始染下一枝，九枝染完后，八十一天的寒冬也就结束了，所以称“九九消寒图”。上面还有九九消寒歌：

一九里天气寒，刘备关张去访贤，顾茅庐三次才相见。
二九里水成冰，招霞捎书玉裴生，关帝庙诉说离乡情。
三九里严冷天，鞭打芦花闵子骞，写休书又把妻子判。
四九里雪花飞，浩然踏雪去寻梅，驴不走只使鞭子催。
五九里占雪梅，数声爆竹将人催，过新年又要添一岁。
六九里是新春，火树银花锦秀林，云霄夜一刻值千金。
七九里天气融，绣楼哭坏了祝九红，想山伯同窗把书攻。
八九里春风和，听罢渔歌听樵歌，牧童儿又把山头卧。
九九里艳阳天，桃花似火柳似烟，俏佳人又把寒食吟。

这字和画是清官李方膺留给临沂人的遗爱。

临沂的素菜闻名遐迩。过去没有专门经营素菜的馆子，但会做素菜的厨师却有不少。因为佛教戒杀，劝人食素，故几处佛教寺院皆以制作素斋闻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白衣庵。这庵位于考棚街药王庙的西侧，乃明朝泾王府的一座寺院。内供一尊铜铸的观音菩萨，两侧为文殊普贤二菩萨，还有道教的一组女神像。它于每年的三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这三个观音菩萨的节日举行法会。此庵是佛道合一的寺庙，所以这庵中住有尼姑数人，还有道姑数人。这道姑中有名叫净虚的，从崂山太清宫学来了制作素斋的技艺。法会时忙不过来，白衣庵还雇了厨师数人，其中名叫刘道和刘玄的兄弟俩最为有名。他们的素菜全部以植物为原料，其高汤乃用豆芽汤制作，其他用料多为豆腐、面筋、腐竹、豆衣、豆腐皮、粉条、木耳、蘑菇、金针、黄花、海带、紫菜、竹笋、兰片、石花、香椿等。素斋不用葱蒜，调味用花椒、胡椒、芥末、元葱等。

庵中制做的甜食也是很有名的，如豆沙馍、玫瑰粽子、枣泥火烧，而制做的八宝饭最为有名。另外制做的仿水果糕点也甚是有名，如用百合制作的牡丹花，用山楂糕制做的葡萄，用红豆制做的桃子，用绿豆制做的黄瓜，用小米面制做的杏和佛手等。可惜白衣庵在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后被彻底摧毁，制做素斋的手艺也从此失传了。

建成新桥话老桥 车过高速忆古道

过去临沂城外主要的桥梁是横跨于沂河、沭河和涑河的大桥。四城门外护城河上还有吊桥。当然，这些桥现在大多已不存在了。

如今面对现代化的大桥，老桥又是什么样子呢？这只能从志书和老人的记忆中寻找了。

最古老的桥是北门外的匝仙桥，它始建于明万历六年（1573年）。清同治时重修添建十三孔，南段三孔。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县长范筑先督工重修。西门外涑河上建有广济桥，乃清道光二年（1822年）所修，此桥是五孔，今已埋入地下，但保存完整。

北门外沭河上清代即建有工桥。秋冬时建好，夏季涨水时拆除。1943年始建石桥，但不久即被大水冲毁，直至1970年始建成大桥。因交通的需要，现在已扩建，更加方便行人。东门外的沂河，明代即建有木桥，位置在旧城东关椿树口、今运输公司家属院东



沂河老桥

侧。至清乾隆辛未年（1751年），举人孙泽世募修300余孔。光绪和宣统时皆增修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因修台潍公路，在青龙寺（今运输公司）东始建沂河公路石桥，此桥一直用到上世纪90年代。

清代，古城的四门外皆有吊桥。到民国初年皆建成单孔的石桥。解放后南门外护城河的石桥改建为“新建桥”，大大的方便了交通。横跨于护城河的桥还有1958年建于东方红影院南的“劳动桥”至今仍在方便行人。

城内的石桥有西门里孔庙的泮池桥，此桥乃明代所建，在棂星门里横跨泮池之上。桥栏雕刻甚美。今此桥已埋于地下，在今大成门外。城北门里路东天主堂后院有一口古井，井下即是一古桥。现今古井也被埋于地下。

至今还在使用的只有一座石桥。那就是在王羲之故居洗砚池东侧的石桥。洗砚池金代称望月湖，上建有石桥。后不知何年毁掉。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洗砚池南北皆为临沂中学校址。为方便交通，在洗砚池东侧又重建一石桥。将池水南北连接起来。此桥一直保留到现在，为王羲之故居保留的最老的建筑。

打开中国地图，从北京到南京画一直线，可以看到临沂正处于线的中间。自古临沂即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两朝皆是驿道必经之地。从皇帝南巡到巡抚视察，举子赴京赶考，驿卒传送文书皆经过这条官道。古驿道自北京至济南，再南下经新泰进入临沂境。每隔十里即有一路碑“官道碑”，附近村庄皆有“护路官户”负责修路。这条官道至青驼寺为一大站，南下徐公店为新站，至半程有茶水站。临沂城为一大站，可住宿。这北来的官道还有东路。这是从济南至青州，由青州至临朐，入穆陵关进沂水，再由沂水向南至临沂。至今沂水还有个乡镇叫马站。这是驿卒可以换马的地方。小说《金瓶梅》中写西门庆自东京返回家乡即是走的这一线路，当然小说中的“东京”应是当时的北京。临沂城的马站设北门里路西，由临沂至郯城在郯城北还有一个马站村，所以临沂是南北官道的中心点。历史有时还会重演。那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步行“大串连”北上南下走的又是这条老官道，成千上万的南北方“红卫兵”皆由临沂经过。

晨昏报时话古钟 夜晚治安忆打更

生活在古城的居民既需要报时又需要治安。清末至民国初年，临沂城还依照老方法进行报时和治安。属于官方的是在四城楼上的大钟，有更卒在上面值班报时。测时靠“铜壶

滴漏”和“更香”。每天晚上8点开始定更。各城门皆关一扇门，各城楼上皆撞钟一响，接着各寺庙也响起了钟声。10点进入二更，各城门皆两扇关闭，城楼响起两声钟响，这时更香第一根已燃尽，开始燃第二根。12点即进入三更，这时已是“三更半夜”了，城楼上响起了三声钟声。凌晨两点又是四声钟响，至四点即进入五更。6点时四城门开门放行，这时五根更香皆燃尽了，各寺庙皆鸣钟，僧道开始念早课，这时已是天大明了。明朝报时晚上还有鼓楼上的鼓声。鼓楼在城东门里鼓楼台巷的北端，清初即已不存了。只剩下一个“鼓楼台巷”的巷名。

民国时，进入上世纪20年代，钟表已普遍存在，报时也改变了方式。废除了更香和滴漏，报时也不再鸣钟，而改用鸣炮。一更鸣一响二更鸣二响，至五更即鸣五响。日伪统治时期不准鸣炮，而改为在四城楼上吹号，即每更吹号一次。

明清两朝古城夜间的治安是靠打更。而更夫又分官夫和民夫。官府的更夫只负责政府所在地的打更。像府衙门东西两巷就叫东更道和西更道。当时官府的更夫是吃皇粮的，他们负责府县衙门和协台道台衙门及官道的打更，官道是指南门大街北门大街，东西门大街。街道小巷即由居民自己组织打更。更夫多是穷苦贫民。他们白天干自己的职业，晚上充当更夫。民间无更所多是借用寺庙，如西南寓的更所即是借用了文昌宫的大门为更所。更夫每晚十人，每更二人。打更时一人执木梆子，一人手执铜锣。从一更开始先敲木梆两响，再敲铜锣一响。至五更则敲五响，让居民知道已到几更了。若遇有盗贼等情况则将锣连续敲打，夜间值勤的兵卒即闻声前来捉拿。冬天更夫特别艰苦，所以除发夜餐费外还提供木柴烤火，无家可归者夜间便去更所取暖。

大的商业和当铺还有自己的更夫。如南当铺是山西人经营，当铺内的更夫都是山西人，墙外的更夫则是本地人。

二更后街上行人渐少，如遇行人即要盘问，若有正当理由，如急病将医等即可放行，如无正当理由即当“犯夜”的嫌疑人，等天明问明白再发落。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后，这种打更治安的方式被取缔。日本宪兵队规定每晚8点后即全城戒严，由鬼子和汉奸队巡逻，居民是不准外出的。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临沂城光复，居民才重见天日，夜间才能自由通行。

“金鸡” 钻石传奇

寇玉坤

据《临沂县志》：“城东南60市里金鸡岭，沂沭河夹间，冈峦绵亘，岭产金刚石，有茶色、浅黄色等，土人往往于无意之中得之，然不恒有。”这金鸡岭素有“金刚石故乡”之称，闻名遐迩。18世纪末西洋人垂涎，德、美商人若白哈根等来此地购置2400余亩岭坡，兴办华德矿产公司经营数载，掠取一批金刚石，然而未曾获特大金刚石。时间推移到20世纪30年代末，金鸡岭出世了一颗特大金刚石（后来被命名为“金鸡”钻石）。然而这一带已沦为日伪统治区，于是在日伪群魔间展开了一场“金鸡宝石追逐之争”。

“金鸡”出世

却说金鸡岭坡西有一座罗莫疃村。约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天的某日，村中罗佃邦老汉在岭坡上翻地整田。干着干着眼看夕阳快要西落了，罗老汉似乎也干累了，最后一锹没踏透，好像碰到了石块，他松开锹把直了腰缓口气。猛抬头见岭顶上那块象征金鸡的巨石闪现着金光，挺直脖颈似要昂首高啼，碰巧远处村中传来了几声鸡鸣声！罗老汉想起了当地“金鸡啼叫，坡岭出宝”的传说。他下意识地用力把锹头踩深，翻出一大块泥沙。在泥沙松缝中显露出一颗浅黄发亮的石子来，他伸手拣起来用衣角擦了擦浮土，石子在夕阳照射下闪现着璀璨夺目的异彩！这是一颗罕见的金刚石！老汉急忙揣入怀中扛着锹回到家，忙叫老伴进屋点上油灯，掏出金刚石观看。微弱的灯光下宝石依然熠熠闪光，有着十二棱面。罗老汉知道，金刚石棱面在8个以上就很珍贵，一般只见过豆粒大的，象山核桃这么大的可真是稀世珍宝了！

老两口无儿无女，快到晚年正愁着生活无依无靠，如今老天爷突然送来这个宝贝，可真是喜从天降。老两口兴奋得一夜未睡好，直唠叨到天微微发亮。罗老汉蓦然想起：听说日本鬼子快要打过来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块珍宝会给带来幸福还是祸暂不能论，要紧的是先藏个妥当地方。老两口在屋内薅摸了一阵子，觉得没有合适的地方，最后塞进床后墙拐角一道裂缝中，又用泥巴抹平，自以为“天衣无缝”了。可惜这颗珍宝，生不逢时，刚

见到阳光，就又躲进了阴暗处，伴随着主人熬度岁月。

卖宝引狼

风云突变，乾坤逆转。度过荒年，日寇铁蹄践踏鲁南，沂蒙群众惨遭战乱艰辛。罗莫瞳村偏僻，侥幸躲过日军的烧杀，却躲不过李庄镇据点伪警察黑狗子们的劫掠骚扰。加之春荒严重，村民们十之七八外出逃荒谋生。罗老汉也打算走，可就惦念着墙中藏着的宝石。可巧老伴积劳成疾，无钱就医，便想到去镇上变卖宝石。这一天，罗老汉怀揣宝石来到李庄镇一家珠宝商号，店主一见这颗宝石暗自吃惊！拿戥子一称，足有一市两八钱重（折合281.25克拉），可真是颗罕见的特大宝石！问价格，店主一时也难定，就随口回答：“能值银洋万多块？”罗老汉过的是以鸡蛋换盐吃的日子，一听能值大价钱喜出望外，就与店主商定，等店主凑齐钱再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罗老汉回到家中仍然把宝石放在原处，又和了些泥巴封好——却留下了新痕迹。高兴地给老伴说，等卖了钱医好病先到河东亲戚家。可万万没想到会出了漏洞！

原来那天在镇上商号卖宝时，曾引来了几位旁观者。其中一个叫朱世平，是伪警所便衣稽查，终日在镇上乱转悠，专干些敲诈勒索的事。那天在商号门口正听到罗老汉向店主打听宝价，一听值上万元的价钱，认为是发横财的好机会，便悄悄约了几个帮手，寻到罗莫瞳村罗老汉家中。进门先假称是镇上珠宝商店主叫来收买宝石的。罗老汉一看这几个穿戴不像商人，忙说：“没，没有宝石。”朱世平冷笑一声：“没有？那你去镇上卖的什么？”罗老汉一听心中一惊，不由得眼往藏宝的地方一瞅。早被朱世平盯着，贼眼也往墙壁溜去，发现了墙壁抹的那块新泥巴，举棍一捅露出了墙洞。罗老汉的老伴本来生病躺在床上，急忙挣扎着坐起倚墙想挡住，被朱世平一扒拉摔下床来。罗老汉急欲上去阻拦，也被人拖住，急得大喊：“土匪抢劫了！”乡邻们闻声赶来，朱世平早已把宝石抢到手中，掏出手枪威协道：“罗老头私藏宝石不缴皇军，要私通八路，警察所来查收的，谁敢阻拦！”说罢，招呼几个同伙扬长而去。

群狼夺宝

朱世平抢到了罗建邦老汉的金刚石，兴致勃勃回到镇上进了一家酒馆，点了菜正要喝酒商议分赃，不意进来一个人，正是顶头上司、所长张三。此人东北籍，心狠似狼，东北呼狼为“张三”，所以镇上人送给他这个外号。朱世平假意奉承着，可张三是有意而来，几句话套出了实情，一边逼朱世平当场交出宝石，一边板着脸打官腔：“诸位今天有功，这场酒记我的帐，算是我请的。这宝石嘛，当然要送交沂州道衙，等上司颁了奖再分给大家。”朱世平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情知张三要独吞宝石，可又斗不过他，心中暗骂：好个黑心狼！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再说张三凭空讹得这颗宝石，回到住所点上灯仔细端量起宝石。这几年他讹诈勒索所得宝石也不少，但要与这颗相比，犹如小鼠见大象——无法比拟。张三估计到朱世平不会善罢甘休，就与小老婆华玉娇商议计谋：他明天去沂州城住几天，叫老婆悄悄把宝石送到附近娘家藏起来。谁知没过三天，沂州宪兵队便衣苟二带着几个大汉登门就问：“张所长呢？”华玉娇说：“早去沂州城了。”苟二冲着华玉娇厉声道：“兄弟是奉川本太君之命，找张所长要宝石的！”玉娇心里一惊！果然不出所料，就按张三嘱咐的说：“是有颗宝石，被老张带走了。”“胡说，搜！”狗腿子们进屋搜了一阵未搜到什么。苟二冷笑一声：“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挥手，上来两个大汉把华玉娇拖到院中绑在树上抽起了马鞭！玉娇尖嚎几声，不一会就昏迷过去了……待醒过来，大汉端来了凉水要灌她。

玉娇怀有身孕自觉抵挡不住只好实说。苟二令狗腿子架着华玉娇又寻到她娘家，硬逼着交出了宝石，回到城里向主子川本献功去了。

张三在外地混了数日悄悄溜回住所，只见小老婆躺在床上，因小产流血过多气息奄奄，泣诉苟二率便衣队抢宝之事。不久便死去了。张三又悔又恨，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料想是朱世平戳的坏，决心找他算账。一打听，朱因献宝受赏，被委任为沐河边醋庄伪的乡公所长，早已走马上任了。没过几个月，朱世平也得到应有下场——活动在沐河沿岸的抗日游击队一夜之间拔了醋庄伪乡公所据点，朱世平被俘，在逃跑时被击毙。

“金鸡”失踪

却说张三因争宝丢了官，死了小老婆，一肚子怨气未消，贼心不死，悄悄潜入沂州城里，妄想伺机盗宝远走高飞。岂知宪兵队长川本定雄是个老狐狸，平时住在宪兵队后院戒备森严。自从得了这颗“金鸡宝石”，倍加小心谨慎，外出行动必带狼狗，遇有形迹可疑的放开狼狗便咬，再带回宪兵队审讯。张三伺窥多日无从下手，转而打听到苟二刚刚升任便衣队长，天天贺客临门，宴会相庆。一日深夜，张三乘乱混入院中躲在暗处。这晚正巧是宴请川本，苟二令小老婆伺候着川本喝得高兴，自己悄悄溜出来如厕。张三见了仇人分外眼红，暗中靠上去一刀戳进后心窝，苟二醉醺醺“哎呀”一声扑地，惊动了屋内的川本，推门一看，墙头上一个黑影正欲外跳，川本举枪一击，随着枪响黑影栽下墙……后来听说张三被狼狗活活咬死。到此，群狼宝石之争暂告一段落。

这颗“金鸡宝石”自落入川本定雄之手后，一直再没有消息，直到日本投降，川本定雄滚蛋，这颗宝石更是像石沉大海，至今杳无踪影。只有“金鸡宝石”的轶闻还在当地流传着。

临沂钩沉之孔门诸子

高 雷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家居临沂的贤人又有多少呢？他们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本篇为你做了浅显的回答。

“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在世界的品牌，没有比孔老夫子更响的名声了。其学习的方法、人格的魅力、思想的意蕴，已经深入到东亚人的骨髓，不是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更何况精神的东西与时间空间无关。

孔夫子的光环不仅表现在自身，而且群星围绕，造就了一大批学生。《淮南子》里讲：“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出孝入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吕氏春秋》更进一步说：“七十人者，万乘之主（指天子）得一人，用可为师。”而生活在临沂地区范围内的孔子嫡传弟子就有十人之多，良辅超拔于际会！他们分别是：曾参、闵损、仲由、言偃、卜商、澹台灭明、原宪、高柴、曾蒧、司马耕等。现一一介绍如下。

曾 参

孔夫子维护的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后世帝王将他的学生曾参之类也敕封为三六九等，搞得亲爷们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曾参位列孔门弟子前列。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诏令以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孔



孔子圣迹图



伋、孟轲四人配祭孔子，称为“四配”，曾参享受到进入核心层的特殊待遇。元至顺二年（1331年），曾参被晋封为“成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封为“宗圣”。《阙里志·宗子世纪》里讲：“圣道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其学独得其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夫子把真才实学传授给了曾参，曾参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嫡传老师，孔伋又教授了孟子，典型的正宗流派。这就是宗圣的渊源。

曾参的来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以业。作《孝经》，死于鲁。”

关于南武城，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是这样说的：“《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县。自古迄明初，无异说，明成化后，忽以嘉祥之后汉金乡县城当之，……，明费人王雅量有《曾子居武城考》，实见《（山东）通志·阙里志》辨驳尤详。”

曾参的故事很多。《说苑·立节》讲：“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曾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在耕田，鲁国的国君派使者要赠送给他一处封地，告诉他说：‘请用封地内的收入来置办些衣服吧。’被曾子拒绝。使者返回，二次重来，曾子还是不接受。使者说：

‘这又不是您向国君乞求的，是鲁君赠送与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子说：‘我听说，接受别人馈赠就会害怕得罪馈赠者；赠送东西的主人也会对收受东西的人流露出自矜的神色。即使国君赏赐了我，而不对我流露自大的情绪，我能不因此害怕得罪他吗？’曾子最终还是没有接受馈赠。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就说：‘曾参的话，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

《新语·慎微》记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汝：你）还，顾反为女杀彘（彘：读音zhi，猪）。’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戏：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欺：欺骗）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遂：于是）烹彘也。”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钩命诀》）”意思是：我志向宣扬礼制；行为恪守孝悌。把《孝经》作为人生的规范，可见孔子对曾参赞誉。

闵 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这段对闵损的介绍中，孔子对闵损的评价非常高，孔子说：“品德高尚的闵子骞啊。身受委屈不质疑父母昆弟亲情。不做官员的家臣，不食有辱国君的俸禄。如果再次提及违背上述原则，我一定渡过汶河躲避。”

闵损不仕大夫，却做过卿的邑宰。《孔子家语·执轡》中有“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说明闵损做过季氏费邑（今费县毕城）的主管。清一代学者许多人怀疑《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如崔述认为：“《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洙泗考信录》）”所以对《孔子家语》辨伪识真，关乎闵损的身份。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为先秦佚籍，是现存最早的

古本，同时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辑《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而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内容与《孔子家语·论礼》也有一致的地方。所以说《孔子家语》实属不谬。

闵损的事迹最早见于《说苑》：“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驾驶）车，失（滑失）辔（缰绳），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你）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无留乎！’子骞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这段已老生常谈，不做详细解释了。

仲 由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意思是：“仲由字子路，又叫季路，鲁国卞邑人氏。家居郊野，比孔子小九岁。其性格粗暴，刚强直率，喜好逞强斗勇，帽子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胸前挂着野猪的牙齿，一副愤青的模样，曾以轻慢的态度侮辱过孔子。孔子不予计较，用礼教感化他。使子路主动换上读书人的制服，签下保证书，心甘情愿地拜孔子为师。

仲由家居郊野来源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徐广集解：“《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尸子》这部书早就亡佚了，我们今天见到只言片段，难以核对。好在《韩诗外传》之中仍保留相同的内容，可以佐证。其中说：“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商）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野人：贬义词，乡下人。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仲由不是卞邑城里人，而是乡下人。《（山东）通志·古迹志》讲“仲里，在县（泗水）东六十里，相传为子路故居，今名仲村（属临沂市平邑县）。”

仲由不仅生活在临沂地域，而且还在此地做过官吏。《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齐乘》考证：“郈城：沂州东三十六里，《左传》定公十年叔孙州仇帅师围郈，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临沂县，大业二年移县于今州理，此城遂废。《通志》郈邑又在郚州须城，非是。”

仲由为郈令还发生过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为，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飧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飧之？’子路佛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其也。今以由之伯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子路做郈邑的长官。鲁国在五月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开工期间，子路用自己的俸粮做成稀饭，邀请民工到五父路上来就餐。孔子听说后，叫子贡去倒掉子路做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国君的属下，你为什么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卷起袖子露出胳膊走进孔子的住处，质问说：“先生憎恨我施行仁义吗？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利益均沾。今天用我自己的俸粮去供给民工，为什么不行？”孔子说：“子路太粗野了！我以为你懂的事理，你却不

懂。你原来是这样的不懂得礼，你以自己的俸禄供养民众，是为了关爱他们。礼法规定，天子爱天下，诸侯爱侯国，大夫爱官职所辖，士人爱自己的家人，越过应爱的界限就叫冒犯。现在鲁君仁政下的民众，你擅自关爱，这是你在侵权，不也属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发动民众而驱使他们，先生让弟子擅自供给徒役吃饭，是想夺取我的民心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

言 偃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子游从孔夫子处学得本领以后，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经过武城，听到了优雅的器乐、声乐。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了礼乐，就会关爱别人；老百姓学了礼乐，就会服从指使。’”孔子对随行的学生们说：“诸位，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认为：“《史记》中，两弟子（指言偃与曾参）皆武城人，独于曾子加一南字，而《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止有南成县，属东海郡。《后汉书》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以此，生后人之疑。”“《齐乘》：‘古武城，费西、滕东两县之间，子游弦歌旧邑。’历考古书，鲁无两武城，故知其即一地矣。”

《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云：“《通典》费县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费县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

卜 商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卜商，卫人。小孔子四十四岁。习于诗，能颂其义，以文学著名。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之。尝适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这段大意为：卜商精通《诗经》，能举一反三，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为人处事斤斤计较，喜欢剖析事理，当时没有人能超过他。曾经前往卫国，听到一个阅读史书的人朗诵：“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说：“错了，不是三豕，是己亥。”阅读者请教晋国的史官，果然说是“己亥”。于是卫国的人都把子夏当成先知先觉。

《荀子·大略》：“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通“侯”）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通“爪”）甲丧其掌。”本段意思是：子夏家境贫穷，破衣烂衫。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做官？”子夏说：“诸侯他瞧不起我，我也不会臣服于他；官吏们自以为是，我还不想再见他们呢。柳下惠穿着同守门人一样破旧，而他的人品和学问却不被怀疑，这是他长期修炼的内功。做官替人谋利好像爪甲离开掌端——那就丧失自我了。”

说虽这样说，卜商还真做过官。朱彝尊《孔门弟子考》考证：卜商为“莒父宰，……晚为卫文侯师。”他做过莒（今莒县）地的主管。

自闵损以下至卜商四人，均为“孔门十哲”。“十哲”源自《论语·先进》，其中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十个人都是孔门中的翘楚，佼佼者，被后人誉为“孔门十哲”。

澹台灭明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台灭明长相丑陋，他希望拜孔子为老师，孔夫子认为他前途黯淡。但有教无类没有拒绝，从此澹台灭明闭门修炼，刻苦读书，没有公事不外出求见官员。游学到江南的时候，同往跟随的弟子三百多人。影响政坛，名闻诸侯。孔子听说了，感叹地说：“我根据说话来判断人，误会了宰予；根据长相判断人，看错了子羽！”

《论语·雍也》记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子游做武城主管的时候，孔子问：“你在那里得到什么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位叫澹台灭明的，做事坦坦荡荡不走后门，没有公事他从不到我家来。”



孔子圣迹·退而攻书

原宪

《阙里志·宗子世纪》里讲：“原宪，字子思，宋人。郑玄曰：鲁人。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夫子没，隐于卫，居草泽中。”因郑玄长期居住南城（古属鲁，今平邑）著书立说，了解周围的风土人情，应该以他的结论为准。另据《（万历）沂州志》：“原宪，字子思，费人。”与前说不悖。

《庄子·让王》：“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纓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翻译为：原宪住在鲁国，矮小的茅屋顶上长满了青草，柴门破碎，桑条做门轴，破瓮做窗圈。两间小屋，破烂衣服填塞着露天的窟窿，房顶漏雨，屋中积水，原宪正襟而坐弹琴唱歌。子贡乘坐着大马车，车棚里边遮光外表素洁，由四匹马拉着，村间小巷都容纳不开，来见原宪。原宪戴着树皮做的帽子，穿没有后跟的鞋子，拄着藜草拐杖应声开门。子贡说：“哈哈，先生你有病

啊？”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贫困，空有理论而不能实行叫做有病，现在我是贫困，不是有病。”子贡向后退着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原宪笑着说：“那种窥测风向行事，结交狐朋狗友，为了被人看重而学，为了获得私利而教，是背叛了仁义，像你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派，我不忍心做呀。”

高 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子羔长不盈（满）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笨）。”子羔在先秦文集中也有写成子皋的，曾做过费、郈等地的主管。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

《齐乘》“高柴，史记作郑人，家语曰‘齐人，高氏之别族。’墓在沂州向子城侧。”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砍掉脚的刑罚，此处为动词）人足，所刖者守门。人有恶（中伤）孔子于卫君（国王）者，曰：“尼（孔子）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跟随）出门，刖（被砍掉脚的人，名词）危（跪）引之而逃之门下室（自己的屋）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刖危曰：“吾不能亏（破坏）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原因）乃肯逃我（使动句：使我逃）？我何以得此（代词：救助）于子？”刖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反复推敲）法令，先后臣以（连词：则）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愀然（局促不安）不悦（高兴），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动词：感恩）公也。”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刮平斗、斛用的小木板）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曾 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蒧，字皙。孔安国曰：‘皙，曾参父。’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蒧也！”大概意思是：“晚春，艳阳高照，脱去沉重的冬袍，换上春天的衣裳，五六个成年人，跟着六七和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在沂河里沐浴，到舞雩台上享受一下风的滋味，悠然自得地唱着歌回家。”孔子感慨地说：“我赞同曾蒧的想法。”

《（万历）沂州志》：“曾点，字皙，南武城人。鄫国之后也。当鲁襄公时，莒人灭鄫，鄫世子巫奔鲁去邑而为曾氏。巫生阜，阜生点，少孔子六岁，学于其门，与琴张、牧皮同称狂者而志在乐天，孔子与之。”

司马耕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诃。’曰：‘其言也诃，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诃乎！’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基本意思为：子牛话多而性情急躁。他向孔子问仁，孔子说：

“具备仁的人，说话谨慎。”子牛又问：“说话谨慎，这就能说具备了仁吗？”孔子说：“达到仁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子牛问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一个君子既不忧愁，也不畏惧。”子牛又问：“不忧愁，不畏惧，这就可以算是君子吗？”孔子说：“自省无罪恶，没有什么忧愁和畏惧的。”

《续山东考古录》：“《春秋》哀公十四年，《左传》：阚氏葬司马牛于邱舆。杜注：泰山南武城西北有舆城（今平邑）。”

现存文献资料可以确认生活在沂州地域的孔门诸子，大概有此十位，这是因为孔门七十二贤，许多人除了名字，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留下资料的人物，不是乡贤，没有宦迹，只是与沂州有所纠结的，本篇也没有涉及。譬如鲁乐子欣（亦称乐欣），朱彝尊《孔门弟子考》里称：“鲁乐子欣字子声，唐赠昌平伯，宋大观中补赠建成侯。”

《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言于定公曰：‘家（卿、大夫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面积单位，三堵曰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季孙、叔孙、孟孙）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堕（毁坏）三都（郈、费、成）。”

《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说的是：孔子命令申句须、鲁乐子欣反攻公山不狃、叔孙辄及其率领的费人，费邑人失败逃走，鲁国人乘胜追击，在泗水与平邑交界的姑蔑把他们彻底击溃。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逃到了齐国，鲁人乘胜拆毁了费邑的城墙。鲁乐子欣，因参与拆迁，到费县潇洒了一回。



“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考

虚静斋主人

老莱子是《二十四孝》里的人物，以“戏彩娱亲”而知名。老莱子，周朝人。至性孝。奉养二亲，备极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有诗为颂，诗曰：

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

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帏。

老莱子，著有《老莱子》16篇（一说15篇），汉魏时亡佚。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从中可以管窥其生平 and 思想观点。

《列仙传》说：老莱子，楚人。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菹苳为食，垦山播种五谷。楚王至门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



老莱子戏彩娱亲图

《高士传》卷上《老莱子》说：老莱子者，楚人也。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饮水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鈇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仲尼尝闻其论，而蹙然改容焉。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终也。

《列女传》卷三《楚老莱妻》说：楚老莱子之妻也。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缊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莱，贤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来，楚王驾至老莱之门，老莱方织畚，王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临之。”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复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之志。”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戴畚挟薪樵而来，曰：“何车迹之众也？”老莱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妻曰：“许之乎？”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鈇钺。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菜而去。老莱子曰：“子还，吾为子更虑。”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谓老莱妻果于从善。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此之谓也。

颂曰：老莱与妻，逃世山阳，蓬蒿为室，莞葭为盖，楚王聘之，老莱将行，妻曰世乱，乃遂逃亡。

一致的说法是，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这个蒙山究竟在哪里？历来说法不一。

第一种说法，鲁国之蒙。《汉书·地理志》云：“泰山郡，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记载：“沂州，费县：蒙山在县西北八十里，楚老莱子所耕处。”蒙山，在春秋时属鲁国，即《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之“蒙”，横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四县，绵延一百五十里。有人认为，鲁蒙虽一度为楚国所有，但从文献所指出的“至于江南而止”来看，这里不似老莱子所居之蒙山。

第二种说法，楚之荆蒙。在今湖北荆门。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荆门州附《蒙山》云：“蒙山在州西一里，两山对峙，如峨眉然。麓有蒙、惠二泉，旧名泉山子，一名象山。”《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皆有类似的记载。《荆门直隶州志》卷三十三《古迹》说：“山庄在城西顺泉侧，老莱子居养亲处也。”今人多以此地作为老莱子所居之蒙山。但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荆蒙离楚国的政治中心郢城太近，仅一百四十里，对于老莱子来说，显然不能作为逃避政治险恶的隐居处所。

第三种说法，楚之萧蒙。此地原属于宋国，为宋公子鲍之封地，后为楚国所占，在今安徽萧县一带。清乾隆《颍州府志》记载：“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今人李水海在《老莱子其人及其思想考述》（载《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坚持此说。但此说缺乏老莱子曾居于此的文献佐证，多推断之语。

第四种说法，新余之蒙。即今江西新余县之蒙山。明初学者梁寅（人称石门先生）在《蒙山赋》中说：《诗经》中《鲁颂》上讲，鲁国拥有“龟蒙”（蒙山的最高峰），在“东海之地”；到周朝末年，鲁国被楚国吞并，原来属于鲁国的“龟蒙”归楚国管辖了；而据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所说，老莱子是楚国人，与孔子同时，是研究老子哲学理论的道学家。他隐居躬耕蒙山之阳，潜心读书做学问，著书十五篇。当时南北两个蒙山都归楚国管辖，而老莱子隐居的蒙山，既可能是“东海之地”的蒙山，也可能是新余之蒙山。但依《史记》等文献所指出的老莱子避世于蒙山之阳“至江南而止”这一史实来看，

湖北之蒙山并不是老莱子的最终隐居之地，也不应该是鲁国之蒙山，而应该是新余之蒙山。这一说法也得到严嵩的赞同，他在《钤山堂集》中记载：明朝时，蒙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土中，挖得当年老莱子躬耕蒙山的农器。不过，严嵩与老莱子相差了两千年，他怎么就能够确定是老莱子的农器呢？

上述四种说法，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确实难下结论。近日，我读《齐乘·龟蒙二山》一书，偶然看到这么一段文字：

蒙山前阳口村有玉皇庙，相传老莱子故宅也。阳口亦山名，后魏费县理此。《高士传》老莱子隐蒙山，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楚王尝至其门，其妻挟薪而至，怪车马迹之多，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鈇钺。先生受人官禄，为人所制，妾不能为人所制也。”夫妇遂相与逃去。

《齐乘》是元代的一部地方志，作者于钦（1284—1333），字思容，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他感于山东一带多兵难，志书多不存，便在任职山东期间，“周览原隰，询诸乡老，考之水经、地记、历代沿革，门分类别，为书凡六卷，名之曰《齐乘》”。作者既为齐人，又官齐地，见闻较确，叙述简赅，虽间有舛误，仍不失为地方志中的善本。《齐乘》将老莱子躬耕之蒙山，确认为鲁国之蒙山，并具体定位在费县，言之凿凿。这一记载，加上《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沂州，费县：蒙山在县西北八十里，楚老莱子所耕处”的记载，为第一种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佐证。

有人以“至于江南而止”来否定鲁国之蒙，则是对文字的误读。仔细阅读《列仙传》、《高士传》、《列女传》的上述文字可以知道，老莱子原来住在蒙山之阳，后来避世才到了江南。这恰恰说明，老莱子原来躬耕之蒙山并非江南。

清光绪《费县志·人物》说：“老莱子者，楚人。当时世乱，耕于蒙山之阳。”完全照搬了《高士传》的文字。编撰者在此文后面加了一段按语：“今县之孝感社孝义村，在蒙山之阳，因老莱子得名。考蒙为鲁境，始终未入楚，楚王安得于数千里外至鲁境求贤？所云楚王驾至其门，必传闻之误载，笔者不之考耳。古书如此者多，不足异也。”

此段议论，初听似乎颇为公允，其实未免过于武断。且不论历史上费县确曾一度为楚国所有，何来“始终未入楚”一说；就以“楚王驾至其门”而言，楚王于征伐途中偶然光顾，亦非完全不可能。

《齐乘》所称之阳口村，位于今山东费县薛庄镇驻地西南一公里，村北即为蒙山，村南有小山叫阳口山。《费县志·山川》记载：“阳口山，俗名箕山，阳口村在其北，山阳村在其南。”考其位置，即今薛庄镇驻地南面的吉山。《费县志·城池》记载：“县城在古笭城北，元魏太和二十年筑，后移阳口山，隋开皇三年复治此城。”与《齐乘》说法相吻合。

沂蒙“红嫂”之二

本 编



精心照料，胜似亲人。



送亲人奔赴前线



妇女担架队抢救伤员



亲人早日养好伤



妇女组成一支支担架队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四

李兴河

曾巩，字子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孔明》曰：

称吴称魏已纷纷，渭水西边独汉臣。

平日将军不三顾，寻常田里带经人。

这首诗从两个方面来写，一方面写诸葛亮为恢复汉业竭尽全力，一方面写刘备为蜀汉求贤任能。诗的首句，写世人谈论称道吴国、魏国的到处纷纷扬扬。诗的次句，写真正在渭水一带致力于恢复汉朝基业的只有诸葛亮。诗的第三句，写要不是刘备当年三顾茅庐，亲自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还是个像平常那样躬耕南亩、研读经书的人。刘备曾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能求贤若渴，爱惜人才，重用贤才，是刘备的高明之处。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写有多首咏赞诸葛亮的诗，《诸葛武侯》是其中的一首：

恸哭杨颢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传？

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诸葛亮作为丞相，能虚心接受属下的善言直劝，“‘闻过必改’而无吝色”。（清·李光地）应当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北宋改革家的王安石对这件事颇受



三顾茅庐图

感动，并从中悟出治理国家必须虚心求贤的道理。于是写了这首七言绝句。诗的第一句，写诸葛亮的属下杨顒敢于对上司善言直劝，诸葛亮又能够对下属的善言虚心接受，这件事真令人感动不已。杨顒，蜀汉襄阳人，字子昭，任丞相诸葛亮主簿。亮常自校簿书。杨顒善言直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今明公为理，亲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诗的第二句，写可惜这样好的风气如今又有谁发扬光大呢？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诗的第三句，提出一个问题：偏安一隅的庸蜀之所以能与魏国、吴国成三分鼎足之势，凭借什么呢？诗的第四句，作以回答，就是因为刘备、诸葛亮能虚心纳贤，从善如流，聚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文武人才。对这一点，清康熙名臣李光地也有与王安石相同的看法：“武侯以区区之蜀能抗衡于吴、魏者，得人力也。”“‘亲贤臣，远小人’，不过淡淡数语，实则千古治乱之经。”王安石对诸葛亮有着很高的评价，在他的另一首《诸葛武侯》诗中称颂诸葛亮是：“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金末著名文学家。兴定进士。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写有《梁父吟》：

盘礴万古心，块石入危座。

青天一月明，孤唱谁与和？

这首诗的诗题下作者原注：“孔明箕踞坐大石山，望月作《梁父吟》。”诗中写诸葛亮独坐大石，望月抒怀，作《梁父吟》的情景。诗的首二句，写诸葛亮坚守着一颗万古不泯的雄心，端坐在那块巨大的山石上。诗的三、四句，写诸葛亮仰望天上明月，独自吟唱《梁父吟》，又有谁是知音，与之相唱和呢？诗中通过对诸葛亮望月吟诗的形象描写，揭示了诸葛亮青年时代的志向抱负。这首诗所勾勒的人物形象，堪称是青年诸葛亮的一幅真实素描。诸葛亮写《梁父吟》，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有这样的记述：“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诸葛亮的《梁父吟》是这样写的：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梁父吟》诗中所写的“二桃杀三士”这件事发生在齐景公时代。据《晏子春秋》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一贯坚持以礼义治国的齐相晏子，入见齐景公说：“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齐景公同意晏子的意见，晏子便设“二桃三士”之计将“三士”除之。对于景公、晏子的这种处置，后之论者褒贬不一。饱读经书、少有“逸群之才”的诸葛亮对这一事件，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这从《梁父吟》诗的蕴意中就可以体味出来。“国以贤兴，以谄衰。”（《潜夫论·贵实》）这是历史的经验。诸葛亮在任蜀汉丞相后，能够与刘备情同鱼水，能够与关羽、张飞等武将文臣和谐相处，才使得“区区庸蜀”能“支吴魏”。也许是从齐国的这一事件中汲取了教训。正如元代诗人杨维桢在《梁父吟》诗中所写：“齐国杀三士，杵臼（齐景公名）不能雄。所以《梁父吟》，感叹长啸翁（指诸葛亮）。吁嗟长啸翁，相汉起卧龙。关张比疆冶，将相俱和同。”

夏原吉，字维喆。湖南湘阴人。明代大臣，成祖时官户部尚书，宣宗时为相。写有《孔明》：

八阵图成已绝伦，《出师》二表更忠勤。



三国八阵图遗址

可怜五丈星宵殒，后主含酸入魏军。

这首诗赞美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忠贞勤勉的精神，对其壮志未酬、蜀汉灭亡深感惋惜。诗的首句，写诸葛亮所创造的八阵图绝妙空前，无与伦比，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在实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人对此屡赞不已：“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唐·杜甫《八阵图》）“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唐·刘禹锡《观八阵图》）“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宋·苏轼《八阵碛》）诗的第二句，写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详陈兴国之计，婉进忠告之言，感人肺腑，所表现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千秋。宋陆游在《书愤》诗中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明沈周在《读出师表》诗中说：“两篇忠告慷慨辞”、“后人能鉴乃能悲”。明刘基在《吊武侯赋》中也说：“览《出师》之遗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清风于万古！”诗的第三句，写诸葛亮出征北伐病死在五丈原营垒中，实在使人哀怜惋惜。诗的第四句，写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降魏，蜀汉就此灭亡，心中又蕴含几多酸楚。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荣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清代著名词人。《咏史》（其八）：

劳苦西南事可哀，也知刘禅本庸才。

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

诗的首句，写诸葛亮忠心仕蜀，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实在令人哀怜惋惜。诗第二句，写诸葛亮也明明知道后主刘禅是个昏聩无能的庸才。诗的第三句，写刘备临死前，在永安（即白帝城）确有向诸葛亮托孤之事。刘备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诗的第四句，写凭诸葛亮的德才威望，完全可以取代后主刘禅，在蜀国也不会有人反对这样做，可诸葛亮并没有自食其言，足见其人格之高尚。

冯景，字山公，一字少渠，清钱塘人。诸生。能诗。写有《题诸葛亮画像》：

管萧真不忝，伊吕岂虚称！

谁料英雄主，终同刘景升。

这首小诗，赞美了诸葛亮的经世之才，批判了后主刘禅的昏庸误国。诗的首句，写诸葛亮与齐国的名相管仲、汉朝的名相萧何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诗的第二句，写称诸葛亮是商朝的名臣伊尹、周朝的名臣吕尚也并不是夸张。极言诸葛亮治

国的雄才大略。诗的第三、四句，写刘备父子的悲剧，尽管刘备堪称一代枭雄，但是他的儿子刘禅却是昏庸无能之辈，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只知一味贪图享乐，毫无建树。赖有诸葛亮辅佐，蜀汉始得偏安一隅。诸葛亮死后，刘禅终于降魏，成为亡国之君，留下了“乐不思蜀”的笑柄。刘表，字景升。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任荆州刺史，据有江汉一带的大部地区，成为当时一股较大的割据势力，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投降了曹操。“终同刘景升”句，即是说刘备父子与刘景升父子的最终结局是一样的。这首小诗，采用强烈的对比反衬手法，一扬一抑，表达了对一代英杰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对昏庸无能的误国之君刘禅的愤慨。

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年号乾隆。1736—1795年在位。乾隆十六年（1751年）南巡时二月初一日驻跸沂州府兰山县，写有《五贤祠》：

王祥王览能全孝，真卿杲卿均致身。

所遇由来殊出处，要推诸葛是全人。

这首诗前有序：“沂州，古琅琊郡，汉诸葛亮故里，晋王祥、王览，唐颜杲卿、颜真卿皆产其地。旧有景贤祠，合祀之。嘉其纯忠、至孝、节烈彪炳，足表范人伦，纪之以诗。”序中交代了这首诗的写作意图。诗中对五位先贤分别从纯忠、至孝、节烈等方面进行了赞美表彰。诗的首句，赞美王祥、王览的至孝，能全孝道。诗的第二句，赞美元真卿、颜杲卿的忠节，能出仕献身。诗的第三、四句，写五贤本来都是超出常人的杰出人才，五贤比较而言，诸葛亮更是较为全面完美的人。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过，这种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较为客观公允的。这首诗在文字上，与《沂州府志》卷首所载乾隆御制诗稍有出入。

《沂州府志》卷首载乾隆御制诗是：“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完人”。这种文字上的差异，可能是中间修改所致，也可能是非一时所写。



临沂五贤祠乾隆御碑亭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一）

编者按：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山东广大人民群众，依靠来自五湖四海的共产党员、革命同志的共同努力，创建、巩固、发展起来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纵队、山东纵队、抗大第一分校的指战员和在山东被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到山东的大批干部，都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山东营救出狱的部分干部

1937年9月，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张友渔与八路军代表张经武，经过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谈判，约400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在9月到11月间陆续得到释放。

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党史委曾搜集过这批党员干部的名单。当时搜集到的比较知名的有以下68人：

赵健民、张晔、李林、张北华、程照轩、夏辅仁、侯得才、魏思文、李仲林、刘特夫、董琰、理琪、姚仲明、章士劳、宋澄、刘泽如、田海山、金明、彭瑞林、刘庆珊、邵德孚、潘复生、邹肇纪、岳拙元、王云生、李文、远静沧、韩维、李枚、陈其人、李云鹤、于冠英、刘坦、周崇德、王长功、田欣农、李瑞芝、王登明、孔繁阁、孟金山、李介人、王堂、刘考文、陈文其、张子明、于世瑞、胡维



郭洪涛率50余名干部从延安到达山东

鲁、宋竹庭、范景遽、李曦晨、冯起、彭健华、史哲、刘仲益、景宜亭、钱兢天、周次温、周明、孙学之、吴导原、王玉珂、刘德轩、马明歧、倪冠英、张俊发、李鹤年、王仲范、崔子明。

1937年10月中央和北方局派到山东的红军干部

为加强对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应山东省委的请求，抽调了8名红军干部到山东工作。他们是：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

1938年5月从延安来山东工作的干部

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从延安的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及中央党校、抗大等院校，抽调了约50名干部，由郭洪涛率领从延安出发，于5月20日到达山东泰安南上庄省委驻地。这批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杨国夫、高锦纯、王文、王彬、钱钧、何光宇、鲍辉、史秀云、白炎波、刘建中、白备伍、苏杰、钟辉、周赤萍、戴凤鸣、黄志才、赵纯、孙光、罗春生、刘涌、刘圣永、杨士进、闻述尧、杨刚毅、杜明、王海珊（王子文）、李国厚、张正富、陈宏（后到）、吴瑞林、潘维舟、杨士敬、林启荣、黄金铭、李德学、李习齐、李炎、罗绩伟、吴坤等。高克亭与马千里中途返回延安，后于8月随黎玉、张经武到山东。

1938年8月从延安来山东工作的干部

1938年8月21日，黎玉、张经武率领由中共中央派遣的16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行军，到达沂蒙山区岸堤。1985年，鲍奇辰同志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整理出130人的名单，刊载于1985年第二期《山东党史资料》。现刊载如下：

江华、吴仲廉、胡奇才、吴克华、徐斌洲、刘海涛、李发、梁海波、陈奇、包剑寒、王凤麟、高克亭、马千里、徐元泉、华楠、宋登华、高锐、鲍奇辰、柴启琨、张迅如、宋灵昭、徐忻（徐勇忻）、易因（女，易英华）、肖松圃、马亚鲁、刘铁梅（女）、高峻岳（高霞村）、赵明（时殿林）、高景鲁、高峻、李林、华山（郑华山）、李敬宇、童邱龙、杨大奎、王涛、靳怀刚、杜前、杨汉章、马万杰、洪林、韩刚、杨心培、盛志明、张鹏展（张建）、李明刚、杨旭春、程力正（于英）、程勇、刘静海（卜才）、卓明、李延久、解锐夫、钱潜、金非青、刘锡九、姚克、张戟、熊传琪、卓君、朱世德（杰）、田兵（王从化）、赫亮、王觉、于平、邱士长、黄其士、李路明、叶扬（尹家厚）、沈平（沈其新）、林元超、康洪章、范筱文、高鲁、孙揆一、雷鸣玉、林乔、寇奎甫、刘然、陈光、何震、张林、刘登秀（刘广平）、何泽广、吴骥怀、李冠元（李真）、梁国栋、鲁生、潘澄、王丰、陈树模、肖雯、刘琪、史青田、王碧澄、夏湖、赵兴凡、吴涛、唐楷常、周瑞迎、王洵、王锡泽、林乔、李瑞卿、孙哲（孙喆）、柳舒、张炯、袁健、魏敬之、张长庚、毛荣光、陈朝举、杜刚、李大孔、王卓、李森、任永年、白富山、贾士贵、何雨田、邵乳群、杨森、楚书明、王思谦、黑诚、罗恒凯、王易、康希夷、陈奇有、季日圣、樊清洁、张大发、李如刚、孙黎、马万垣、叶田等。

姓氏百家漫谈——赵姓 (下)

赵丹峰



赵匡胤



赵光义

宋代是赵姓所出名人为多的时期。他们中，既有赵姓的帝王和公卿，亦有在文化领域各领风骚的贤达。说起赵姓名人，应首推赵宋王朝的创建人赵匡胤。赵匡胤，涿州（今属河北）人，系西汉京兆尹赵广汉的后裔。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周世宗死后，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京师开封。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镇、定二州谎报辽和北汉兵南侵，后周宰相范质、王溥即遣赵匡胤率禁军出城御敌，此时京城中便传播着“点检作天子”的舆论。待赵匡胤到达距京师城北20里的陈桥驿时，其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与军中诸将便将早已预备好的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作皇帝。赵匡胤遂回师京城，由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在宫中为内应，便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这个新建的王朝遂建国号为“宋”，称帝后的赵匡胤，是为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即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相继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从而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国长达两个世纪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而且结束了五代时期的野蛮武人（主要是沙陀人）统治，使国家进入了理性文治的新的历史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亲历五代乱世，为重建中央集权的统治，防止唐代后期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局面的重演，他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削夺了禁军将领和藩镇割据的兵权。公元961年，宋太祖召集拥戴他称帝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进宫宴饮。趁酒酣微醉之时，宋太祖便对诸位大将道：“如不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日，但作天子有太多的艰辛，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睡觉都不安稳！”石守信等人忙询问原因，太祖即道：“我这个皇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忙叩头道：“现在天下已定，谁敢

有异心呢？”太祖又道：“你们几个我当然信得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当中一旦有人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众将吓得涕泣叩头，第二天即称病辞职。太祖解除了他们统领禁军的兵权之后，即派他们外出做节度使。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称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便在赵普的建议下，通过制度设计，剥夺了地方军事将领的权力：首先，太祖将节度使这一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由实职改为荣誉职位，同时委派文官出任地方官，称“知（管）军州事”（简称知州），管理一州军政。三年一换，平时向朝廷奏事，直接对朝廷负责。这一做法承延后世，成为赵宋定制；其次是于各路设置转运使，一路所辖州县所收财赋除留少量作日常经费外，其余均要上纳朝廷，即财政权收归中央；其三是收其精兵。公元965年，太祖下诏各州衙门，令其将所辖军队中的精壮兵士均选送至京城补入禁军。如此一来，全国精兵皆集中于禁军，地方军队中多剩老弱病残军士，从而消弭了地方与朝廷抗衡的能力。同时，太祖又立更戍法（亦称出戍法），派出禁军实行定期轮换，禁军妻、子则留住京师。禁军军官提升时，皆调离原来的军队。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将领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这种“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制，使禁军将领不能拥兵割据，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央一级，太祖在宰相之外又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以分割宰相事权；又设枢密院，置枢密使，执掌军事政令，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权。枢密使与宰相有要事分别奏请皇帝，彼此不相知；设三司（号称计省），置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执掌财政；设监台以执监察之责。太祖时御史台初无专官，至太宗时，始设专职的监察御史（察院），考课官员得失。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及百官的过错，均可提出谏言，但在弹劾高官时，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被弹劾者本人。上述政治制度，对防止大臣专权且互相进行制约，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太祖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使科举大兴，唐代时每次录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而宋代每次录取进士则多达二三百人，从而大大拓宽了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太祖虽系武将出身，但对文人却恩爱有加。相传，他曾秘立誓约，规定其后代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于宋太祖的首倡，“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遂成为宋代最为鲜明的政治特征。在经济方面，太祖注重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垦荒，整疏以汴梁为中心的运河，以增加赋税收入与运输能力。公元976年，宋太祖死，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

宋太宗本名匡义，其兄即位后，为避皇帝名讳而改为光义，即位后改名为炅。他基本继承了太祖确立的国策和政治制度。为恢复幽云十六州，遂对辽国进行讨伐，但经公元979年的高粱河之战和986年的雍熙北伐两次大战，宋军皆大败而归，宋朝遂对辽采取守势。说起宋辽边争，澶渊之盟是个分水岭。1004年秋，辽国大军进犯宋朝，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城下，威胁宋都汴梁，宰相寇准主张坚决抵抗，恳请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真宗在寇准的陪伴下渡过黄河，来到澶州北城。当前方将士看到皇帝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的城楼上时，顿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声音传出几十里之遥。在真宗到达澶州之前，辽军主将萧达凛率先锋军攻城时，被宋威武军张环突发环子弩射死，本来就士气大挫的辽军，此时听到宋军的呼喊声，更是心惊胆战。辽萧太后在此战受挫、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的情况下，便有心讲和。此时，不想再战的宋真宗派曹利用去辽营讲和，因双方都有讲和意愿，遂进行议和谈判，之后两国便订立盟约，基本内容有：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涿、瀛、莫三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防；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

匹，至雄州交割；双方于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因澶州亦称澶渊郡，所以此盟约被称为“澶渊之盟”。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将澶渊之盟定性为“屈辱”。然今日的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澶渊之盟并不是屈辱的。盟约生效后，宋朝在边防裁减驻军，每年可节约军费近千万两。更为重要的是，自订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在日后的百余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争，这对百姓安居乐业和朝廷发展经济、文化是十分有益的。

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无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均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诸多帝王的诏令首倡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宋代创造了高度的政治文明，这在司法制度的健全与政府社会职能的完善方面体现得尤为鲜明：在司法制度方面，为做到有法可依，宋太祖下诏修订《重定刑统》30卷和《建隆编敕》4卷，颁行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印行的法律汇编。在机构上，朝廷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御史台除行使刑事监察职能外，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亦是法定的上诉机关。对于社会上争议较大的案件，则由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审理。在地方，实行路、州（府）、县三级三审制，在路一级专设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宋代十分重视尸检，并制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南宋著名的法学家、提刑官宋慈的《洗冤录》，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法制大环境下得以形成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开创了中国古代政府履行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先河，提供了直至今日仍可资鉴的成功经验。宋仁宗赵祯在位时，颁布“胎养令”，规定没有经济来源的怀孕妇女，可获国家补贴。绍圣三年（1096年），宋哲宗赵煦颁布《详定重修敕令》，对社会救济体系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后经多年探索，这一救助体系日趋完善。南宋中期后，婴儿局、慈幼局和慈幼庄等专门慈幼机构开始由政府设立。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先在临安创设慈幼局，对弃婴和孤儿由政府出钱雇佣乳母喂养，并派大夫为孩子医病。如有人想抱养这些孩子，需要与政府订立契约。为杜绝弃婴现象，政府还对抚养孩子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在临安慈幼局运作成熟之后，宋理宗赵昀又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翌年又提出了“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的要求。对老年人，宋代陆续设立福田院和居养院等养老机构，其福利之高，以至令“贫者乐而富者忧”。宋徽宗赵佶在位时，还把国家养老的标准由60岁降低为50岁。人死后，国家还补助祭祀之费。

宋代，诸多帝王十分重视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宋代在开国之初，即鼓励农民垦荒扩植，规定只要开荒并缴纳税赋，农民即可拥有开垦地的所有权。1069年，神宗赵顼即颁布《农田水利法》，并设专门机构淤田司和浚河司，制定兴修水利规划并组织实施。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每年夏收时，皇帝均到田野观看麦收情况。所设立的皇家园林中亦种植稻麦，实际上成为帝王、大臣们了解农业生产和进行农事试验的场所。在向江、淮、浙推广占城稻之前，真宗赵恒就在皇家园林对该品种做过多次试验，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孝宗赵昚对范成大进呈的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十分重视，命人先在皇家园林试种，发现该麦种穗大饱满，就下令在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

宋代科技甚为发达，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其中有三项如活字印刷的创造、火药用于实战、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等科技成就，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医学、建筑业等亦有长足的发展。《黄帝明堂经》因唐末战乱遗失，针灸在医疗中失去了标准，导致大量误诊病例。这一问题引起了宋仁宗赵祯的注意，他遂命著名医学家王惟一设计了针灸铜人，并颁布《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作为国家标准执行。有宋一

代，与外族军事斗争不断，边患频仍，因此朝廷对加强军事科技创新十分重视，给予奖励，并加以推广。宋太祖对武器制造非常关心，他曾每隔十天就查核一次各种兵器的质量。高宗赵构还曾亲自改进克敌弓，使之在对金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发明于唐末的火药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公元970年夏，冯继升向朝廷进献他研制的火箭，因实验成功，便得到宋太祖“衣物束帛”的奖赏。在朝廷的鼓励下，后来又出现了带爆炸性的霹雳炮。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矶之战中使用霹雳炮，给金军以很大的震慑，为夺取这场水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战使南宋转危为安。宋代，除了私人的科技著作以外，朝廷还组织人力编纂了一批科技著作，如《武经总要》、《军器法式》和《营造法式》等。《营造法式》始编于王安石变法期间，因疏漏较多，不切实用，宋哲宗赵煦即诏令李诫进行重修，并于1103年颁行全国。《营造法式》系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具有极高的科学及史学价值，直至现代还被应用于建筑施工，受到世界建筑界的重视。

宋代是继唐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和黄金时期，优美的宋词创作、突出的丹青艺术成就、以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等，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中间，帝王本身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与推动，是造成宋代文学艺术辉煌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太宗赵光义购募前人墨迹，纂成《淳化阁贴》，淳化元宝上的字亦系太宗亲题。高宗赵构还撰有书法专著《翰墨志》。在帝王中，文艺成就最突出者当数徽宗赵佶。徽宗不是一位称职的好皇帝，但却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他的书法具有瘦细峭硬而又腴润洒脱的神韵，自成一家，号“瘦金体”。作为画家，他不仅提高了画院的地位，还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在其推动下，一系列传世名画相继创作问世。徽宗善绘花鸟，以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还工诗，著有《宣和宫词》三卷。靖康之难后，他先后被囚禁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和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其间写了不少悔恨、哀怨、凄凉的诗作，其中一诗写道：“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所流露的切肤之痛，令人感伤回味。

综上所述，宋代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和科技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走在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前面，尤其是在关注民生方面的做法，至今仍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所以，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但为何长期以来宋朝被曲释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虽然国富但却弱兵，不符合人们富国强兵的盛世理念。造成这一畸形发展的国情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与宋朝历代君主所推行的“抑武崇文”的国策有关。前面说过，宋太祖为防止唐代后期藩镇拥兵坐大的局面重演，推行了抑武削权的政策，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此举虽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因将帅无权，对下级情况不熟，不能知人善任，导致上下指挥脱节，军令不能畅通。加之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大减，以至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竟不能披甲上马。太祖、太宗这些马上皇帝因身经百战，可亲自领兵作战，但日后的皇帝均出自深宫，不谙军事，由其制定作战方略，实属勉为其难。朝中大臣均系文人出身，一遇战端，只知争论不休，往往坐失战机，以至在与北方辽、金、元等马上民族的战争中，往往胜少败多。这一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在宋代，除上面述及的帝王外，还有一批赵姓人士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作出了建树：赵普系北宋著名政治家、一代名相。后周时系赵匡胤亲信幕僚，帮助策划陈桥兵变，夺权建立宋朝。宋朝立国后为宰相，建议宋太祖削夺大将军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建议实行更戍法，经常变换军队驻防，使兵将分离，对加强中央集权统

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参与谋划太祖实行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国家统一战略及对辽实行守势的策略。太宗即位后又两次为相，后因病去职，封魏国公。赵普少习吏事，读书不多。晚年时方养成读书之习，罢朝归来，便闭门诵读。待次日临朝，则处事果断、有条不紊。及死，家人开其书篋，见篋内只存《论语》二十篇。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其后人遂将“半部堂”作为自己家族的堂号。

赵昌、赵令穰、赵伯驹、赵伯骕、赵孟坚系宋代著名画家，五人中除赵昌外，其他四人皆系皇家宗室，其中赵令穰乃赵太祖五世孙。他们的画作各有特色：赵昌重写生，常于晓露未干之时观察花卉，随即调色摹写，使其作品活色生香，有“妙于傅色”之誉，大中祥符间，名重于时。赵令穰善画山水小景，画作意境幽远、诗意盎然。黄庭坚曾赋诗赞其山水画：“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赵伯驹、赵伯骕系兄弟画家。伯驹画作色彩清丽活泼，改变了唐代精工浓丽的画风。受宋代水墨山水的影响，二人青绿山水由大青绿向小青绿过渡，使其画作富丽且雅逸。兄弟俩曾合作为高宗绘集英殿壁画。伯驹的传世作品《江山秋色图》卷系现存不多的青绿山水画之精品。伯骕的《万松金阙图》卷，被清人安岐誉为“画中之奇品”。官至太守的赵孟坚，善画水墨梅兰竹石，还擅长白描水仙，画韵高雅，对后世文人画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期的赵姓文人还有诗人赵师秀和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之夫）等。

元代，赵孟頫以其卓越的书画和文学成就名扬当朝且影响后世。赵孟頫系宋皇家宗室，宋太祖之子赵德芳的后裔。宋亡后，归故里湖州闲居。元世祖搜访“遗逸”，被人举荐后任兵部郎中，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他工书法，尤精正、行书和小楷，其书圆转遒丽，世称“赵体”。他善丹青，人物、山水、花鸟画兼能。尤以画马见长，居“元四大家”之首。他认为“画作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师法唐代大师，托古而改制，使其画作“有唐人之致去



赵孟頫
幽篁戴胜图

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他主张“书画同源”，将书法用笔带入画中，以写代描，充分发挥笔墨特长。正因如此，其画作便具有圆润苍秀、简率飘逸的神韵，从而为元代开创了新的画风。存世书法作品有《洛神赋》、《胆巴碑》、《四体千字文》等；传世画作有《鹤华秋色》、《秋郊饮马》、《红衣天竺僧》等。他兼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赵孟頫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且还是位杰出的诗人。他以宋宗室的身分仕元，曾引起许多人的非议，故其诗作多抒写仕元的悔恨心情和对故国旧朝的怀念，《岳鄂王墓》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此诗对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陷杀忠臣良将、辜负中原人民期盼统一意愿的行径，进行了斥责，同时对民族英雄岳飞含冤而死表示了痛悼。悲叹江山易主、英雄长眠、无力恢复汉室的心情跃然纸上，使原本“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西湖景色平添了一股悲凉气氛。亦有清新疏朗的作品，如《渔父词》：“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短短数句，就将渔夫自在逍遥的乐趣写得惟妙惟肖，读之令人顿生返璞归真的向往之心。

明代，赵南星作为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名显于世。赵南星系万历二年进士，为官清正，嫉恶如仇。任考功郎中时，专司审察京师员吏之责，因罢黜贪官污吏而被毁谤削职。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复职，任左都御史，尽责整顿纲纪。天启三年（1623年）任礼部尚书。时宦官魏忠贤专权祸国，赵南星作为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与顾宪成、邹元标并称为东林三君），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恶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天启四年十月，魏忠贤矫旨将赵南星和左都御史高攀龙削职流放代州，卒于戍所。待思宗朱由检即位后方获昭雪，被追谥“忠毅”。赵南星工散曲，所作散曲淋漓酣畅，磊落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清代，一批赵姓文人多有建树：赵翼系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乾隆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中年后辞官家居，主讲安定书院，专心治学著述。他于史学建树最显，以考据精赅、严谨不苟著称。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誉为清代考史三大名著。论诗主张创新，反对摹拟。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所作《论诗》二首，颇能代表其诗歌创作应与时俱进的观点：“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赵之琛系清代著名篆刻家。篆刻工整挺拔，尤以单刀驰名。系“西泠八家”之一。赵之谦是清末著名篆刻家和书画家。在篆刻方面，他汲取前人之长，别创新格。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在书法方面，他以魏碑笔势书写行书，用笔坚实而流宕。在绘画方面，他善画花卉，系晚清国画大写意一派的开山之祖，对后世影响颇大。

现代以来，赵姓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突出者。有数位赵姓先驱为民主革命斗争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赵世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参加旅欧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6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兼法国组书记。1923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翌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1925年1月，代表党组织赴天津迎接孙中山北上。同年11月，领导了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革命群众运动。1926年，组织并参加北京“八·一三”群众示威游行。后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任中共江浙省委代理书

记，7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年仅26岁。赵博生，系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西北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董振堂等在宁都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红十四军军长，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后在江西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牺牲。赵尚志，系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率部与日军进行斗争，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英勇不屈，壮烈殉国。赵登禹，系著名抗日将领。1933年率部驰援喜峰口，参加长城抗战，因战功升任第二十九军132师师长，后被授中将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率部增援北平南苑，7月28日遭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后被追赠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最早牺牲的中国高级将领。

在科教文化界，赵姓名人主要有：赵元任系著名语言学家，通晓中、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在语言文字、汉语音韵、汉语方言和汉语语法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享有盛誉。赵九章系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是中国宇航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曾主持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的研制。赵忠尧是著名物理学家。他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两台静电加速器，并进行了原子核反应的研究，为中国原子核科技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文学艺术界，赵姓不乏大师级人物：赵树理系当代著名作家。1943年起，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一批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其作品语言生动质朴，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内容主要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与孙犁、周立波、柳青一起被誉为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画卷的“四大圣手”。赵丹系当代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从1930年初从事电影艺术表演工作，先后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李时珍》、《林则徐》、《聂耳》和《在烈火中永生》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在电影和话剧舞台上扮演了近50个角色。他的演技炉火纯青，其表演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神韵，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一位集表演、文艺理论和绘画艺术于一身的文艺大师。赵丹一生命运多舛，抗战时期赴新疆开拓戏剧工作时，遭盛世才迫害，系狱五年。“文革”中又被江青投入狱中，饱受摧残。晚年作国画《芍药图》，并题诗曰：“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不羨大富贵，泼墨作白芍。”可谓是对自己一生艺术追求与艰辛遭遇经历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有两位赵姓人士在小品这一舞台上为人们带来了欢声笑语，这就是赵丽蓉和赵本山。赵丽蓉原系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晚年亮丽转身从事小品表演。赵本山则系东北草根出身，由二人传转演小品。上述二人的表演风格各具特色，但都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分别被誉为“小品之后”与“小品之王”。

此外，著名法籍华人画家、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赵无极和美籍华人、美国联邦政府首位华裔女部长赵小兰等，均系赵姓族中在海外成就大业的英才。



忠肝义胆仁者心

——好个曹玉军

刘凤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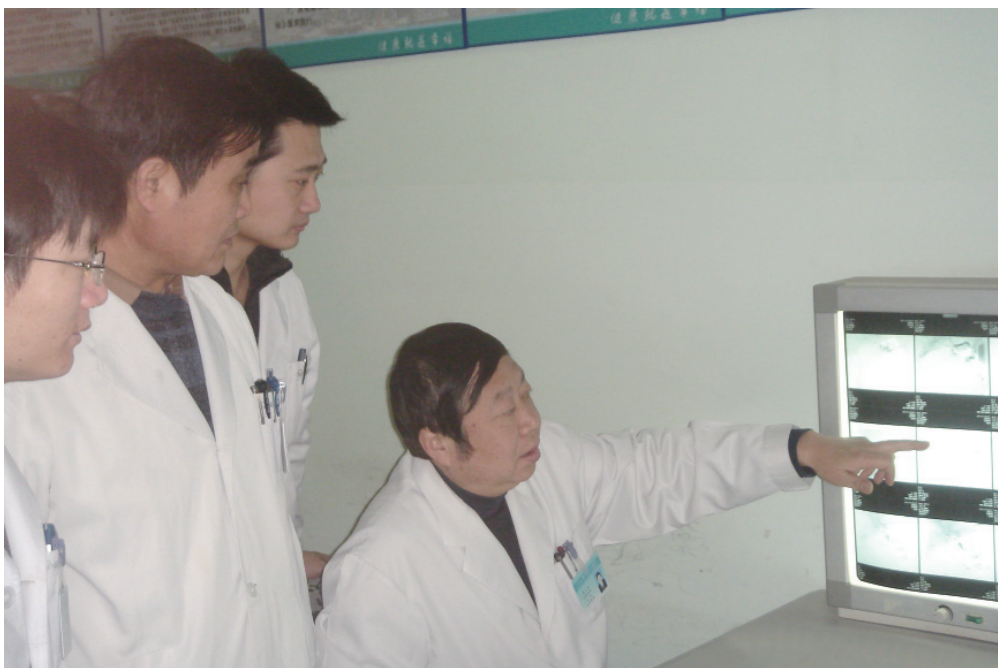
中国人特别看重、讲究“肝胆”。古人不但在生理上将“肝胆”视为人身之“将军之官”，而且赋予其特殊的人文内涵，或喻品质德性，或喻性格胆识。查权威词典，“肝胆”之意，除了指人之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文意义上，一是指心地、道义、人格，如“忠肝义胆”；二是指勇气、胆魄、血性，如“肝胆过人”。为人为医，不仅要有康健之“生理肝胆”，尤需一副阳刚之“精神肝胆”，两两相合，方得做人为医之“大道根本”。

曹玉军，不愧肝胆外科的大专家、“得道”者。作为市人民医院大外科副主任、肝胆外科主任，同时又是省肝胆外科等学会委员，市普外学会副主任委员、肝胆外科学组长，他完全称得上中国“肝胆文化”的优秀代表。他不仅深谙精通肝胆外科之术，更以自己的仁心妙手，对救死扶伤的天职竭尽忠诚，对无数深受肝胆疾病之苦的患者竭尽道义。面对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专家，大家都会为之喝一声——

好个曹玉军！

肝胆相照为黎民

了解曹玉军的，知道他有两个“大”特点：一是擅于作大手术。作为肝胆外科专家，这自不待言。但是他的大手术尤其快捷。如极为复杂、难度极



大的胰十二指肠肿瘤根治综合切除方面的手术，一般的医生，顺利做下来，全国来看，目前平均需要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而在曹玉军手里，平均只需要三个小时。当然，“成功”是根本前提，也是终极目标。二是喜欢研究“大问题”。笔者初次与之交谈，本以为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非同凡响”的精彩故事，不料他倒首先向我“发难”，单刀直入，对我提了一个社会“大问题”——怎么看待“医患矛盾”，大大将了我一军。此乃当前社会热议、上下注目、不断发酵、问答两难、各执一辞的棘手难题。我极力开动思想，一声叹息：“唉，此有‘四难’：当老百姓难，老百姓得了病更难；当医生也难，当个专家尤其难。对各所难处，相互多一点理解、谅解，是否好一点？”我这罗里罗嗦的解答，不想得到了曹玉军的认可。后来我才发现，这位擅于思考社会大问题的专家，对此其实早有自己的明确答案。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市政协委员，熟知并坚信党的统一战线16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把16字方针绝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了自己的工作实际中。在他所带领的肝胆外科，到处都能看到、听到他所力倡和践行的品牌：“肝胆相照，妙手仁心”。这一品牌，不正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最有效的良策吗？

早在沂水中心医院担任大外科住院总医师时，曹玉军就留下了与患者肝胆相照的美谈。一次，医院来了一位76岁的农村老太太。老人患胰腺炎症，先到上级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后来又发生脓肿坏死，病情加重，岌岌可危。家人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中心院的。曹玉军再次诊断后，果断将患者作为危重急症者，予以收治，手术治疗。症状缓解后，又耐心精心地为其进行恢复护理治疗。数天后，老太太“枯木逢春”，痊愈出院。家人感激不尽，几天后，给曹玉军和同事们送来了满满一大篓新鲜牛肉。他们再三推辞，患者家人执意不肯。最后，全科医护人员来了顿“牛肉大餐”。这顿牛肉大餐给曹玉军的体味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们首先对患者肝胆相照，他们怎么能不“涌泉相报”呢？

医疗特别是外科属于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尤其是面临危重疑难患者之时，医生要承担极大责任与压力。加之医疗环境之复杂，因此，有些医生在风险面前往往退避三舍。但是，曹玉军认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应当勇于面对与承担风险。几年前，有一位巨大肝血管瘤患者找曹玉军求治。其血管瘤已经侵及右肝静脉并压迫中、左肝静脉，手术死亡率极高，曾到上海某著名肝胆医院求诊，被该院的知名教授宣布为“不治之症”拒收。无奈，辗转来到市院肝胆科。曹玉军毅然收下了这位患者，为其切除了血管瘤，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宁愿自己承担风险，也要挽回患者之生命，这就是曹玉军的价值观。

曹玉军常说：仁心，不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口号。他对同事们大力倡行的敬业精神，就是必须把“仁心”具体化为四心，即对患者的耐心，精心，细心，尽心。几年前，一位重症胆管炎合并胆囊积脓的病人，手术后出现应激性溃疡大出血，上级医院专家会诊认为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当时正值“十一”休假，曹玉军放弃休息，在病房连续对其施救。整整三天两夜，他眼睛没合，茶饭无味，紧紧地盯在病床前，治疗护理只手担，使病人转危为安。对每一个危重病人，只要不脱离危险，不渡过关口，他从不离开病房。最长的时间，一位患者他整整陪同了两个多月。调入市人民医院的头十年中，他一直住在医专，离院十里路。即便是假日休息或深更半夜，无论是风雪漫天还是雷霆暴雨，只要科里说来了急重症患者，就是骑车步行，他都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急匆匆赶到病人身边。

几年前，肝胆科收治了莒南县一位严重患者。病人因患肠梗阻坏死，在县院抢救治疗，先后两次手术，没有治愈反而发生肠痿等严重并发症。病人痛苦不堪，治愈渺茫。无奈，只得转到市人民医院。曹玉军为患者再次作了手术，采取各种措施，长时间予以精心护理。患者家境平平，数次手术也感到了沉重负担，患者的父亲陪床中累得双腿肿胀。见此情状，曹玉军心中隐隐发疼，十分不忍。他把科里平时节约或留下的所有能用的药品，全部无偿用在患者身上，同时动员科里的同志们向患者伸出温暖的双手，为之捐款捐物。

曹玉军的精湛医术与一片热心，终于使患者渡过了重重难关，康复出院。病人无以回报，但是回报了一片心，在整个莒南，为曹玉军竖起了一片“肝胆相照为黎民”的口碑。

这些年，曹玉军先后被评为全院劳动模范，全市优秀党外干部。

肝胆过人手回春

曹玉军深知，作为一个医生，具备“忠肝、义胆、仁心”，是立身行医之本。但仅仅如此，绝对不够。必须要有一双“妙手”。而“妙手”，除了业精于勤，同样出于“肝胆”，就是要有“肝胆过人”的勇气与胆魂。

1956年，曹玉军生于沂蒙山腹地——沂水县黄山铺镇的一个村子。少年时的他，就表现出聪颖天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总是名列前茅。然而，肯定是从小受革命老区斗争传统的影响，肯定是看多了《红日》、《南征北战》等反映发生于沂蒙山区的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少年时代的“春秋大梦”、人生理想，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长大去当兵，“奋斗目标”是当将军，驭马率兵，叱咤风云，指挥若定，建功立业。但“革命传统”却板着严肃的政治面孔，与他开了个人生玩笑。因为那时他家庭中有一个根本弄不明白的什么“社会关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军旅梦”。非但如此，连习文弄墨、知识报国的权力也差点给他剥夺而去。他以管区第一名的成绩考高中，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社会关系，只能当了替补，幸亏补了“缺”。高中时他的成绩又名列班级第一，然而上了不长时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社会关系”，又使他不得不辍学归家。幸亏他学习优秀，农村缺少师资，被镇里聘为联中教师，带了几个班级的课，才没与学生生涯绝缘。“社会关系”的副作用一直延伸，恢复高考时，竟然连报名的条件与资格都不具备。1978年再次高考，正当他对“习文”也失去了希望时，十分喜爱他的原班主任老师反复动员鼓励他再次报名。终于，他在绝望中迎来了“社会关系的春天”，也是他的“人生春季”——考入了沂水医专。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从此变成了“医患关系”。

怪不得曹玉军对医患关系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1981年，曹玉军毕业，分配到沂水县王公社卫生院。是“金钢钻”终会脱颖而出。1983年，他到沂水中心医院参加培训，很快表现出了在外科上的独到天赋与实际能力。于是，中心医院领导坚决地留下了这个人才。孔圣人对自己的人生之旅有名言曰“三十而立”，大约是成功者的普遍规律。“而立”之年，曹玉军开始担任中心医院的大外科住院总医师，独担大纲，不仅能熟练地进行各种外科手术，而且所有急重症患者，都由这位总医师负责处理，名噪沂水一方。

1990年，曹玉军再上台阶，调入市人民医院。当人们对这位沂水中心医院主刀究竟如何拭目以待时，他出手不凡，技惊四座，几例手术下来，引来一片赞叹：这岂止是沂水中心医院外科医生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市院同行的水平！

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市院的条件与环境，更给曹玉军提供了不但可以临床施展手段的平台，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提高、发展的阵地。他以自己的胆识，不断探索，总结，创新，突破。在肝癌、胰腺癌、高位胆管癌、肝门部胆管狭窄、肝内外胆管结石、重症坏死性胰腺炎、疑难复杂的胆道病变等等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及病理研究上，在微创外科治疗肝胆等病症上，一项项独到创新、富有特色的技术在他手中创造，一个个难关被他攻破，一个个高地被他攻占，可谓硕果累累，精彩连连，他也由此获得了多项奖项。

“门静脉高压症”是肝胆病患中的“老大难”。为攻克这一难题，省科技厅专门立项作为重要科研课题，并将此艰巨任务交由曹玉军。他结合多年临床实践，深入研究病理，苦心揣摩，不断实验，终于创造发明出“贲门周围血管离断加肠腔静脉侧分流术”治

疗此病的新技术。此术选用脑病发生率低的肠腔静脉分流，联合胃底贲门周围血管离断，取长补短，减少了术后再出血的可能，降低了脑病发生率，并利于改善肝功能，消除难以控制的腹水，即便是已经腹水的患者也是适应症。术后随访，远期效果理想，腹水消失率100%。此成果一举获得全省医学科学进步三等奖。目前已做此类手术数百例，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公认，专家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几年前，科中收治了一位82周岁高龄的老年患者。老人得的是“胰头壶腹周围癌”，属于罕见病例。此病灶位于胰液、胆液、胃肠液“三江汇集枢纽”，手术复杂，更加患者高龄，风险极大。若在从前，基本束手无策。但是，曹玉军不仅收治了患者，而且只用3个小时，就顺利地做完手术，不久，老人在儿女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康复出院。其后，曹玉军带领科里同志们，专程登门回访。只见老人神采奕奕，大有返老还童之相。原来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早在1994年，曹玉军就在手术治疗此类疾病上研究出了新招，创造了“胰十二指肠切除胰空肠翻转套入式吻合术”，手术速度快，并发症少，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他们共行此术100多例，有时一天能连续做两例。老人来治疗时，他们可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举重若轻了。

“肝门部胆管癌”也称“近端胆管癌”或者“高位胆管癌”，指原发于胆囊管开口以上，主要侵犯肝总管和其分叉部分以上的左右肝管有胆管腺癌。由于癌肿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其周围血管神经构造的复杂性，手术多禁区，操作十分棘手，过去临床治疗难以做到根治性切除。近年来，虽然随着外科技术及影像学诊断水平的提高，手术治疗水平也有改进，但是绝大多数病人需要同时做半肝或三叶肝切除，而大范围的肝脏切除又带来许多的并发症。2000年，曹玉军决定向这一难关发起进攻。经多次研究实验，他在创新手术式上下功夫，终于创造出“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肝胆管空肠‘桥袢式’吻合术”。此术对肝方叶或肝中央楔形切除后，再行左、右肝管与空肠桥袢式吻合，重建肝肠通道，既实现了肿瘤有效切除，又达到了肝脏最小范围切除和最大限度的肝功能保护目的，有力地避免了传统术式的弊端和局限。这项重大突破和新技术，在国内也处于领先水平，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肯定和患者的普遍信赖。获得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本院“特殊贡献奖”。截至目前成功实施30多例。

“腹壁肠造瘘”是过去治疗直肠癌解决排泄问题的传统技术。但是此术无法解决患者术后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和心理障碍，留下了严重无名痛苦。曹玉军应用研究的“低位早期直肠癌经骶尾后根治切除腹膜外直肠吻合保留肛门术”，易于操作，简捷方便，安全度高，创伤小，成功率高，更避免了原来术式的不良后果，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此项手术的应用研究获得全省首届普外中青年学术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专家鉴定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0年的一天，曹玉军刚刚做完一台手术、疲惫不堪地走出手术室，火急火燎的病房护理人员冲到他面前，不由分说，拉着他就往病房跑。原来，一位患者在胰十二指肠手术后，反复内出血，此刻突然加重，心率降低到只有50次左右，情况凶险。曹玉军把全身疲惫一下扔到九霄之外，立即组织抢救，同时果断采用新的措施治疗内出血，又一次创造了化险为夷的奇迹。大家对他的胆识，更加由衷佩服。

年前，科里收治了一位中年妇女患者，经诊断，其患有巨大肝血管瘤，瘤体竟然达到30*20*20厘米。若行手术，存在瘤体破裂导致腹腔急性大出血的危险。然而毕竟艺高人胆大。在征得患者及亲属同意后，曹玉军精心准备，亲自手术，顺利切除下一重达5公斤血管瘤。在他们精心护理下，病人康复出院。此项手术成功，标志着曹玉军与同事们的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病人们常说：“看见曹主任来治病，再重的病，也觉得放心了。”

这些年来，曹玉军共主持省级科研课题4项，市级5项，获省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

市级奖5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其创新胆识与成绩，得到组织的大力褒奖与充分肯定，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主任医师，被评为院中的拔尖人才、技术骨干、10佳医生，更被评为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侠肝义胆走边疆

1996年底，医院动员组织人员，参加援助新疆的医疗队。尽管内地许多人会唱“我们新疆好地方”，尽管大家都很想一睹真漂亮的“达坂城的姑娘”的芳容，尽管人们都很想大啖几口“大又甜”的哈密瓜和“肥而香”的抓羊肉，但是，毕竟离家万里，一去三年，更何况远去边陲，大漠孤烟，还时不时发生漫天的沙尘暴呢？

其时，曹玉军正值“年到不惑”。家中有老母亲需要伺奉，妻子工作繁忙而且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孩子面临高考，院中更有许多的工作，手头还有正在紧张进行的科研课题。一去三年，这许多的事情都得撂下，甚至都得耽误。再说，他并不是中共党员或者共青团员，不必一定去当这个先锋战士。

但是，对这些困惑，他保持了“不惑”。他是一个医生。他清醒地知道，既是“援助”，那里肯定有许多的患者需要救治。治病救人，以人为本，以需为急，再远再苦，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戈壁深处有疾苦，闻风而动真丈夫”！曹玉军的“忠肝义胆仁心”，此时似乎一下变成“侠肝义胆赤心”，增添了极大英雄气概。他慷慨请命，决意援疆。

1997年春节刚过，年味正浓。农历正月初八日，领导和同事们为曹玉军送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曹玉军旌旗猎猎，奉命出征。

他被分配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从此，他以自己的“侠肝义胆仁心”，与这里的人们结下了一段深情厚谊。

此地的疾病患者确实不少。加上曹玉军是内地来的外科专家，慕名而至的患者也不在少数。在这里，他完全没有时间概念与上下班之分，一天到晚，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只要来了病人，只要病人需要，他就像得到命令，雷厉风行。辛苦一天，晚上刚要打个盹儿，又响起了电话声或者敲门声。有时，一天晚上，他竟然要起来五六次，这觉睡得简直是“支离破碎”，提心吊胆，标准的神不守舍。

那一天，那天的那些事儿，让曹玉军至今记忆犹新。上午，他像个陀螺，忙得团团转。下午，他像个战士，为抢救一位上消化道大出血的危重患者，冲锋陷阵。直至半夜，他才疲惫地拖着两腿回到宿舍。实在抬不动的眼皮刚刚合上，一阵汉语掺杂、叽里呱啦的嚷叫声和急急忙忙的脚步声又传到他的耳朵里。凭着职业敏感，他意识到又来了急重病号，一个激灵爬起来。果不出所料，人们抬来了一位年事已高的维族重伤者。曹玉军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老人遭受的是严重胸腹部复合伤，肝脾俱破裂，肋骨骨折，导致血气胸，同时骨盆骨折，已经失血性休克。曹玉军倦意全无，立即开始紧急抢救，包括手术时间，整整进行了9个小时，总算把这位老人从地狱门口硬硬地拉了回来。术后一连三天三夜，他守在老人身边，当老人病情真正平稳后，他一颗高悬着的心，才轻松落了下来。老人康复后，带着家人，捎着特产，来见曹玉军。他们手捂胸口，虔诚地向这位救命恩人反复地“热合买提，热合买提！”（谢谢）此时，曹玉军品尝着他们赠送的哈密瓜，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沁人心脾的甘甜。

对贫困患者，他更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既为他们看病治疗，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一位全胰腺切除的病人，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曹玉军见状，主动给他捐了400元，解了他燃眉之急。病人出院后，自然又是捎着同样的特产来答谢，自然对曹玉军又是一番数不清的“热合买特！”

新疆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干旱少水。春秋多风沙，遮天蔽日；夏日温差大，早穿皮袄午穿纱；冬季更难熬，雪大风紧。为了给维族群众解除病患，提供方便及时的治疗，面对种种困难，曹玉军都无所畏惧。他经常深入到乡村、厂矿、学校等，巡回义诊，送医送药。深山中，戈壁滩，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朝阳中，余辉下，都映照着他的侠肝义胆。

在喀什，曹玉军不仅亲自救治了无数病人，让他们感受到了崇高的医德医风，也给他们送去了先进的医疗技术，部分必须的医疗设备。为了更好地提高当地医疗水平，改善医疗条件，他积极主动地向带队领导和本院领导写申请、打报告，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在他努力下，院领导特别批准，每年派出短期医疗队，每批四五人，以帮助当地开展大手术，加强薄弱科室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医疗水平的提高。市院党委书记、院长尹传贵同志，多次亲自带队，到喀什看望鼓励曹玉军，指导帮助当地医疗工作。曹玉军还专门力邀全国知名外科专家、上海的吴肇光教授前去指导。年近80的大教授，被他的执着精神和感情深深感动，不顾年事已高，不辞风尘颠簸，亲赴喀什，指导手术，培训学员。为了让当地医疗人员开阔眼界，提高水平，曹玉军还积极帮助他们走出新疆，走向外界，到发达地方考察学习。在他协助下，当地普外科、神经外科和病理科等多名医生到我市人民医院免费学习培训。3年期间，曹玉军在当地医院，主持开展了全胰腺切除、颈动脉体瘤切除、高位胆管癌根治切除等13项新技术、新项目，为当地填补外科空白达16项之多。

曹玉军的奉献精神、突出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赞扬。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陈建国到喀什看望援疆人员时，专程来到医院，看望曹玉军，予以表彰和鞭策。曹玉军连续3年被评为支援边疆建设“先进工作者”、“优秀工作者”荣誉称号。

当地老百姓与医界同行，更不会忘记曹玉军的一片热心肝胆、深情厚意。时至今日，每逢过年过节，他们还主动打电话，满腔热情地向曹玉军致以问候、祝福。

侠肝义胆走边疆，曹玉军，“亚克西！”

披肝沥胆待同仁

2003年，一场瘟疫在神州爆发流行——“SARS”（非典）。在党和政府统一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特别是医疗战线，四处设置抗击非典的铜墙铁壁。临沂市人民医院也专门设置了非典门诊与病房，严阵以待。

一天晚上，曹玉军接到医务处紧急电话通知：从潍坊市转到我院一名患者，疑似非典感染，已住进非典病房。请曹玉军从本科派人，前去参与诊断并治疗。

毋庸讳言，这个通知给人的心理感觉与这个任务的额外份量。非典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也毋庸讳言，许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都会把它与死神联系在一起，谈虎色变。曹玉军是科主任，当然心知肚明，当然可以随意派科里的任何一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是，把危险推给同仁，把安全留给自己，这不是他的“肝胆”之血性与风骨。他二话没说，像听到冲锋号的战士冲向第一线，立即行动，坚定地去了非典病房。经细心检查，患者发烧，咳嗽，化验肺部有感染，很像非典，但还是“疑似”。他极为慎重认真地对患者先做了对症处理，要求严密观察。后来，患者症状消失，康复出院。最后认定为非“非典”。

此事看似是“虚惊一场”，但是，领导和同事们从中更看到了曹玉军的一片大丈夫之“肝胆”。曹玉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及时救治了患者，排除了“非典”，在最前沿、第一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市人民政府的隆重表彰。

他不但对事业、对人民一片“忠肝义胆”，在支边援疆上一片“侠肝义胆”，而且对同仁们、在自己的团队建设上，表现得“披肝沥胆”。“披”者，“披露，敞开”；“沥”者，“滴滴，全尽”，意为赤诚坦荡，尽心尽责。



从他在科室建设上提出与规范的一整套理念与定法，可以看出他的“披肝沥胆”。他在科室提出的打造品牌是：“肝胆相照，妙手仁心”。前已记述，此不赘言。

他对同事们大力倡行的敬业精神是：“四心”，即对患者的“耐心，精心，细心，尽心”。前已例举，此也不多解。

他在全科大力提倡的服务理念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以高度的敬业精神给予患者温馨、周到的关怀与照顾。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把质量放在首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现代化医院中，在包装师、策划家、广告商们已经把今天的一切弄得天花乱坠、鼓吹得让人一头雾水中，能在曹玉军的团队中，见到如此朴实无华的“警言恒言”，如此恪守遵行的“红色传统”，让人倍感亲切与真诚。

他认定的合格外科医生的标准是：“三高”，即高度的责任心，高超的技艺，高尚的奉献精神。

他总结的基本原则是“医疗安全”：连病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都保障不了，谈何治病救人？此乃医院与医生的百年大计，永恒主题。

他甚至借用了偶然与巧合，把自己的“抽象”理念形象化、启发式地向全科同事表述出来：“我们必须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有时代紧迫感。我们肝胆科位于我院主体大楼的12层，我们应该以最优质的服务，最饱满的热情，让患者12分的满意，让社会12分的满意，让院领导12分的满意！”

没有曹玉军这种披肝沥胆的意识与感情，谁人能想到这种“偶然”与“巧合”？！

薛其坤：走向不惑，走向成功

高雪萍

薛其坤，蒙阴县人，1963年12月出生，清华大学物理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九届信息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国际杂志《Surface Science》和《Nanotechnology》的编委。

薛其坤长期从事超薄膜材料和纳米结构的制备、表征及其物理性能研究。在物理学和相关领域较有影响的国际会议如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美国材料学会年会、美国真空学会年会、扫描隧道显微学大会、分子束外延大会等做过50余个邀请报告。

薛其坤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1994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9年先后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和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物理系学习和工作。1999年至2007年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至2005年任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年起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同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年起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2011年起任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年3月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科研院院长。

薛其坤发表文章330余篇，被引用超过6100余次。在国际会议上应邀做大会主题特邀报告100余次，其中四次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做邀请报告。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5）、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2006）、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5、2011）、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2010）、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2011）、陈嘉庚科学奖（2012）、“万人计划”杰出人才（2013）等奖励与荣誉。

薛其坤领衔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联合团队历经数年攻关，首次成功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研究成果将会推动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可能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该物理效应从理论研究到实验观测的全过程，都由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3月15日凌晨，历时4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这项被3名匿名评审人给予高度评价的成果，是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于1880年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3年后，首次实现的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也因此被视作“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

作为微观电子世界的量子行为在宏观尺度上的完美体现，量子霍尔效应一直在凝聚态物理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美国科学家霍尔分别于



1879年和1880年发现霍尔效应和反常霍尔效应之后，不少科学家凭借在此领域的重要发现斩获大奖。1980年，德国科学家冯·克利青发现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82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美国物理学家施特默等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这个效应不久由另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劳弗林给出理论解释，三人共同分享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此次薛其坤领衔的中国科学家发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因为不需要外加磁场，成为多年来该领域一个非常困难的重大挑战。首先，它与已知的量子霍尔效应具有完全不同的物理本质，是一种全新的量子效应；其次，它的实现也更加困难，需要精准的材料设计、制备与调控。因此，这项全新突破也被视作“有可能是量子霍尔效应家族的最后重要成员”。

据介绍，量子霍尔效应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在未来电子器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用于制备低能耗的高速电子器件，从而推动信息技术的进步。然而，由于普通量子霍尔效应的产生需要用到非常强的磁场（通常需要的磁场强度是地磁场的几万倍甚至几十万倍），应用起来十分昂贵和困难；而且其体积庞大（衣柜大小）也不适合于个人电脑和便携式计算机。

自2009年起，薛其坤带领团队向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实现发起冲击。四年来，团队生长和测量了1000多个样品，利用分子束外延的方法生长了高质量的磁性掺杂拓扑绝缘体薄膜，将其制备成输运器件并在极低温环境下对其磁电阻和反常霍尔效应进行了精密测量。终于发现在一定的外加栅极电压范围内，此材料在零磁场中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了量子霍尔效应的特征值 $h/e^2 \approx 25800$ 欧姆——世界难题得以攻克。

“这是我们团队精诚合作、联合攻关的共同成果，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薛其坤强调说。

成功是靠勤奋努力而非偶然。薛其坤教授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七）“科学与人文：双赢和融合”做了题为“走向不惑——我的求学之路”的精彩报告。他详细谈到了他的两年考研失败、七年读研坎坷、八年留学苦乐和九年创业喜悦。他曾两次考研失利，但是没有放弃。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八年留学研究期间，面对重重困难与挫折，以“异于常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完成了研究任务。

薛其坤教授总结道：“我个人人生的第一个体会就是勤奋”。他强调，“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努力是无限的”，“人生总会有一些坑坑洼洼不顺的时候，总要找到一些办法去解决问题。”他真诚朴实与幽默生动的演讲风格和鼓舞人心与发人深思的成才之路深深吸引了参加讲座的师生。

我们相信，走向不惑之年的薛其坤，将秉持其勤奋与乐观的精神，继续创造成功。



市史志办领导到涝子峪村检查指导工作。10月9日，临沂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领市史志办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等一行11人，到沂南县双堠镇涝子峪村检查指导工作，并看望“第一书记”驻点工作组。

市史志办到沂南县开展“结亲连心”活动。10月9日，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和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党员干部到“结亲连心”活动联系村——沂南县双堠镇艾于社区尚店大组走访结亲。

按照要求和走访分工，史志办每名党员干部与14到19个农户进行“认亲戚”“结对子”。市史志办人员分头深入农户家中，发放联系卡和走访材料，直接了解群众的诉求，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帮助群众解疑释惑，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期间共走访群众174户，发联系卡174张，征集群众反映问题10余条，对群众提出的涉农问题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给予了认真解答。

市史志办应邀参加城市区志2013年学术年会。11月5日至8日，中国地方志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3年学术年会在杭州市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74篇，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史志系统的120位代表与会。市史志办总编辑王瑞柱应邀与会，其论文《论〈城市征收拆迁还建志〉编纂的理论架构与篇目设置》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会上，临沂市史志办被选为理事单位。

市史志办副调研员于芹到临沭县指导县志续修工作。9月27日，市史志办副调研员于芹一行三人到临沭县史志办反馈续修《临沭县志（1986~2007）》（送审稿）专家审阅意见，并就进一步做好续修县

志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沂水县志办指导《林场志》编纂工作。10月9日，沂水县志办工作人员到县国有林场总场，与《沂水县国有林场志》编纂人员进行了座谈。县志办工作人员从编纂志书的意义、志书资料的收集、篇目设置、体例、文风方面做了细致的讲解，就编纂好《沂水县国有林场志》进行了指导。

《费县年鉴》创刊发行会召开。10月30日，《费县年鉴》创刊发行会召开。首部《费县年鉴》采用文字、图表、照片相结合的排版方式，彩版印刷，共计103万字，设有专记、大事记、政党政务、乡镇概况、人物等20卷，创新设计了史志公益广告，重点对费县2011、2012年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就进行了全方位记述。

临朐县史志办到河东区参观考察。11月15日，潍坊市临朐县史志办主任刘建国一行三人到河东区参观考察。两县区史志办交流了各自工作开展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联系、共同推进当地史志工作进行了沟通和探讨。

康熙年间《费县志》完成整理印刷。10月8日，费县史志办公室经过前期紧张整理、校注等工作，顺利完成康熙年间《费县志》的出版印刷，为全县古代史志资料的研究与使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次整理的康熙《费县志》刊印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由知县黄学勤主修，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费县志书。该书将清代以前费县发展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史料，春秋时期孔门弟子曾参、闵子骞等在费县的生活足迹，唐代颜真卿、颜杲卿兄弟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动人事迹，明代以王雅量为代表的费县士绅为官、为人、为文的人文情怀，

都得到了较好的表现，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整理过程中，费县史志办公室充分利用现有人力和资料资源，多次到各级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并聘请多名教授、专家校注、审阅，几易其稿，终于完成这部旧县志的整理印刷。此次整理出版的康熙年间《费县志》分为四册，第一、二册以简体字重新竖排，增补标点，个别疑难处加注释，并对所载史实进行考证、校勘；出版的第三、四册为影印本，充分保存了古籍原貌，便于读者对照查阅。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十一）。《临沂市志》组稿工作进入收尾阶段，11月上旬，办公室主要领导亲自给10个市志供稿后进单位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市志科同志跟进督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截至11月底，《临沂市志》134个供稿单位中，已有118个单位报送市志初稿，46个单位的市志稿完成初编。为了更好地开展市志编纂工作，11月14~15日，市史志办总编辑王瑞柱一行三人赴威海、青岛、淄博三市史志办学习二轮修志先进经验，就志书的编纂、出版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